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 20

第 2 卷第 20 期

总第 31 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 1
华东师大与华为联合发布《大模型背景下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研究报告》 2
2025 互联网岳麓大会主题论坛在湘潭大学举办 3
国际动态 | 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重要性认知跌至历史新低：趋势分析与潜在动因 4
国际动态 | 沙特与澳大利亚深化教育科研合作：构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 5
国际动态 |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首次跌出英国大学排名前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蝉联榜首 6
院校动态 | 北京师范大学发布“2025 冬芽计划” 助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建设 7
院校动态 | 大连理工大学：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 8
院校动态 |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8
院校动态 | 山东大学坚持“三个聚焦” 加快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 10

高教研究 12

高水平大学培养研究型卓越中学教师的路径探索 | 谈哲敏 12
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下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动因、内涵及路径 | 申国昌 周璇 20
在“学习化”浪潮中重新发现“教”的价值——对高等教育学习化现象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 柴楠 柯毅婷 21
文科教育 | 文科新为 | 张程程 35
文科教育 | 开复旦文科新局 | 吴振东 陈潇雨 41
文科教育 | 中国人民大学：承时代之问 建中国之学 | 鲍赫 魏梦佳 45
文科教育 | 中国社科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 岳栋 49
文科教育 | 不止于“诗和远方” | 陈涛 53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大学教与学的侵蚀：批判视角下的滥用与价值质疑 | 利奥·麦肯 西蒙·斯威尼 56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评估的颠覆性挑战：一项关于“棘手问题”的研究发现 | 托马斯·科尔宾 大卫·鲍德 玛格丽特·贝尔曼 菲利普·道森 57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0 期
第 2 卷第 20 期·总第 31 期
2025 年 9 月 26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战略规划 | 高等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要紧贴时代背景 | 李志民 58
战略规划 | “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性特征及改革发展策略构想 | 王辉 60
战略规划 | 从国际大都市角度谋划上海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空间布局 | 屠启宇 64

他山之石 67

借鉴与超越：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 | 高杭 67
以“智”谋质：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与特征 | 白玲 王芬 68
高校如何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一项基于国外高校 14 份 GenAI 应用指南政策文本的质性研究 | 王兴宇 陈恺 68
国外著名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研究 | 吕宇静 杜严勇 69
日本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战略及其分层体系设计研究 | 牛可心 顾岩峰 69

高教动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

9 月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上海市市长龚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出席成立仪式并致辞。怀进鹏代表中国政府与阿祖莱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所址协定》和《运行协定》。

怀进鹏向研究所正式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对研究所筹建提供的有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是中国与教科文组织首次合作建设的一类中心，其成立是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重要历史里程碑，是中国与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推动开放科学、开放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研究所与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网络的有效结合，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发挥不可或缺的支持性作用。我们将认真履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与世界各国合作创新，支持研究所不仅成为 STEM 教育先进理念的发源地、教育思想的试验田，更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科技创新和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为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实质性贡献。

龚正说，当前上海正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战略擘画，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我们将以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为契机，着力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着力提升全社会科学素养，着力推进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把上海打造成国际 STEM 教育发展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上海将全力支持研究所发展，为促进全球教育改革创新、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阿祖莱说，非常荣幸在上海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上海集聚了知识智慧、科学创新以及历史沉淀，为国际 STEM 研究所打造了一流的场所，我们对各方的支持深表感谢。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源远流长，此次在上海设立一类机构，愿景宏大，意义非凡。研究所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一类机构的网络，推动 STEM 科学的发展，将促进全球教育平等发展，帮助世界各国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主持仪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贾尼尼参加仪式。

2023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2 届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的决议。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是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首次落户中国，这是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 10 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性一类中心。研究所的主要职能是促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教育，涵盖从幼儿到成人的各个阶段，致力于为全民提供包容、公平、适切和优质的 STEM 教育。

（来源：教育部官网）

华东师大与华为联合发布《大模型背景下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研究报告》

华为全联接大会 2025 期间，在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部信标委”）的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东师大”）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联合发布《大模型背景下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旨在探究大模型重构教育生态和赋能高等教育典型应用场景，为我国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教育部信标委主任、华东师大教授吴永和、华为公共事业军团副总裁、公共事业解决方案开发与集成验证部部长孙鹏飞、华为公共事业军团教育行业解决方案总经理陈浩、华为中国区政企教育科研业务总经理阮东闽、华为企业培训与认证部院校业务总经理党张波，浙江华为院校业务总监赵爽出席发布仪式，共同见证《研究报告》对外发布。

教育部信标委主任、华东师大教授吴永和在《大模型背景下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研究报告》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大模型赋能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应遵循"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原则，以标准化与场景化并重为主张，以能力建设与制度供给并行为策略，持续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效率与公平，协同共创智能、高效、开放、可持续的高等教育新格局，实现人机协同共创高等教育美好的未来。

《研究报告》基于智能时代大模型赋能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的政策导向和发展战略，剖析了大模型背景下重塑高等教育体系走向智能、高效、开放、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教育大模型的核心要素，赋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维度分析，给出了教育大模型的标准体

系、参考架构、核心技术、实施路径、典型案例与治理措施，打破壁垒、融合创新、机制完善与治理协同，构建人机协同的高等教育新范式，助力高校构建智算生态体系、重塑专业体系建设、变革知识生产范式，着眼共同发展与职责担责，为我国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注入核心动能与借鉴标准。

华为公共事业军团副总裁、公共事业解决方案开发与集成验证部部长孙鹏飞表示，未来，华为将持续加大教育创新投入，深化与全球教育机构、院校及教育部信标委、华东师大的精诚合作，共同探索并推动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前沿实践，携手构建面向未来的智慧教育新生态。

了解更多《研究报告》，请下载：

https://e.huawei.com/cn/documents/campaign/education/dcaad91606054b69b6b99b45f3cf0ed4

（来源：华为企业业务官网）

2025 互联网岳麓大会主题论坛在湘潭大学举办

9 月 15 日，2025 互联网岳麓大会“AI+数字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主题论坛在湘潭大学举行。来自政府、学界、企业界的嘉宾齐聚一堂，共议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新机遇与新路径。湖南省 2025 年 100 个“数字新基建”标志性项目之一——韶峰数智教育平台发布。

湘潭大学校长廖永安表示，湘潭大学紧跟国家战略，通过系列举措大力培养数字化创新人才。论坛聚焦 AI 技术前沿与创新应用，交流 AI 与数字教育深度融合的行业趋势、创新模式与生态，共同探讨未来数字教育的发展路径和 AI 赋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体系构建，为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双向奔赴搭建了桥梁。

会上发布了韶峰数智教育平台。该平台由湘潭大学湖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与湖南韶峰应用数学研究院联合研发。平台基于国家“双一流”数学学科优势与底蕴，打造“高标准、多类型、全覆盖”的大学数学数字资源体系，并通过 AI 深度赋能教、学、练、评、荐、研等多个教育场景，形成以智能批改、精准评价、定向推荐、资源生成、答疑解惑等为主体的智能体矩阵，既是教师的智能教学助手，也是学生的智慧学习伙伴。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深入剖析了 AI 与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创新性提出

“师—生—AI 协同课堂”三步法教学模式（导引、研讨、总结），认为 AI 赋能教育的关键在于“协同而非替代”，这既是挑战，更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大机遇。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际动态 | 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重要性认知跌至历史新低：趋势分析与潜在动因

根据盖洛普（Gallup）2025 年 8 月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仅 3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大学教育“非常重要”，创下自 2010 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这一数据较 2019 年的 53%大幅下降，与 2010 年 75%的峰值相比更是呈现断崖式下跌。当前民众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认知呈现三分格局：40%认为“较为重要”，24%认为“不太重要”，后者比例较 2019 年增长超一倍，较 2010 年的 4%实现六倍增长。

人口学分析显示，所有社会群体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均出现显著下滑。18–34 岁青年群体在 2013–2019 年间降幅最大，但此后各年龄层均出现急剧下跌，目前各代际群体中仅约三分之一持“非常重要”观点。传统上更重视高等教育的群体——包括女性、有色人种（people of color）、大学毕业生和民主党人（Democrats）——虽然仍保持相对较高的认可度，但其“非常重要”的支持率也已跌破 50%。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Republicans）的支持率下降幅度相近，但态度结构差异显著：49%的民主党人持“较为重要”立场，仅 9%认为“不太重要”；而共和党人则呈现两极分化，39%认为“较为重要”，同等比例（39%）认为“不太重要”。

卢米纳基金会（Lumina Foundation）的补充研究揭示了认知矛盾性：尽管重要性评级下降，但 59%的家长仍希望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其中 40%偏好四年制大学，19%选择社区学院），无学位成年人中也有多数认为学士/副学士学位极具价值。这种认知差异可能源于多重因素：高等教育成本攀升、职业教育优势凸显、在线教育与微证书（microcredentials）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AI）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重塑。值得注意的是，对高等教育机构信心的下降（过去十年下降 22%）与重要性认知的降低存在不同动因——前者主要与政治倾向（38%批评高校左倾议程）和课程实用性（32%认为教学内容不当）相关，而后者则呈现跨党派一致性下降特征。

当前数据表明，美国社会正在重新评估高等教育在个体发展中的定位：虽然 75%民众仍

肯定其基本价值（“非常”或“较为”重要），但将其视作必要选择的群体比例持续萎缩。这种转变既反映了教育多元化的社会趋势，也预示着劳动力技能认证体系可能面临结构性变革。后续研究需重点关注 AI 技术冲击、替代性教育路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成本效益比变化对公众认知的持续影响。

（来源：盖洛普（Gallup）官网）

国际动态 | 沙特与澳大利亚深化教育科研合作：构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

沙特阿拉伯教育部长优素福·本·阿卜杜拉·本·阿扬（Yousef bin Abdullah Al-Benyan）于 2025 年 9 月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标志着两国在教育与科研领域的合作进入战略深化阶段。此次访问以高层会晤为核心，涵盖政策协调、学术合作、技术转移与投资促进四大维度，全面对接沙特“2030 愿景（Vision 2030）”与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化战略。

在政策协调层面，本·阿扬与澳大利亚教育部长贾森·克莱尔（Jason Clare）达成三项共识：首先，双方将建立“大学联盟机制”，通过结对计划（twinning programs）实现至少 20 所高校的课程互认与学分转换，并设立年度 300 名师生交换名额；其次，在科研领域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可再生能源与健康科学四大前沿学科，计划共建联合实验室；第三，针对沙特在澳留学生群体，将优化签证政策、增设文化适应课程，并建立校企联合实习网络。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TVET）成为沙特的重点引进对象，双方同意在利雅得设立“澳式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首批将培养能源技术与数字医疗领域的专业人才。

课程改革与教育技术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本·阿扬与澳大利亚课程开发专家菲尔·兰伯特（Phil Lambert）教授达成协议：沙特国家课程中心（National Curriculum Centre）将引入澳大利亚“未来技能课程框架”，重点强化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评估标准。双方将合作开发智能教学系统，计划在 2026 年前完成 200 所试点学校的数字化教室改造，集成虚拟现实（VR）教学与人工智能学习分析技术。教师培训方面，澳大利亚教育学院将协助沙特建立“教师专业发展认证体系”，首批认证涵盖 STEM 教育、特殊教育等紧缺领域。

投资合作呈现双向互动特征。在悉尼举行的沙特-澳大利亚商务理事会会议上，沙特方面宣布三项激励政策：为在沙特设立分校的澳大利亚高校提供土地租金减免；对教育科技企

业实行 5 年税收优惠；设立 20 亿美元专项基金支持联合科研项目。澳大利亚沙特商业论坛主席萨姆·贾姆希迪（Sam Jamsheedi）透露，目前已有 8 所澳大利亚大学在沙特开展合作办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双学位项目”将于 2026 年招生。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合作已延伸至教育全产业链，包括教材开发、智慧校园建设及教育大数据应用等领域。

此次合作具有显著的互补性特征：沙特凭借“2030 愿景”提供的政策红利与资金优势，可快速吸收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课程标准化与科研转化方面的成熟经验；澳大利亚则通过此合作网络，将其教育服务出口扩展至中东市场。正如贾姆希迪强调的，这种伙伴关系已超越传统的学生流动模式，正在形成"教育–科研–产业"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未来三年，双方计划将合作院校数量提升 40%，联合科研论文产出增长 50%，这将对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来源：国际教育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PIE）官网）

国际动态 |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首次跌出英国大学排名前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蝉联榜首

根据《泰晤士报》与《星期日泰晤士报》联合发布的《2026 年优秀大学指南》，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与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首次在该排名 32 年历史中双双跌出前三，并列第四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连续第二年位居榜首，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和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分列第二、三位。杜伦大学凭借排名从去年的第五跃升至第三，同时获评“2026 年度大学”。

编辑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es）指出，杜伦大学的显著提升得益于教学质量和学生体验的改善，其学术表现“尤为突出”。该排名综合评估了教学满意度、入学标准、研究质量、可持续性及毕业生前景等指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榜单结果存在差异：在《卫报》2026 年大学指南》中，牛津仍居首位，剑桥排名第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除蝉联综合榜首外，还获评“学术表现年度大学”“罗素集团年度大学”，并在“毕业生就业年度大学”评选中位列亚军。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等分列第六至十名。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虽未进入前十，但获“年度大学亚军”。

区域奖项方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杜伦（英格兰北部与东北部）、剑桥（东部）等校分获所在地“年度大学”称号。戴维斯强调，顶尖院校竞争加剧导致部分低门槛大学面临招生压力，更多学生选择就近入学，因此今年新增区域奖项与奖学金评选。

杜伦大学副校长凯伦·奥布莱恩教授（Karen O’Brien）表示，该校通过全方位支持确保学生成长，其毕业生职业前景已获校友网络验证。

（来源：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官网）

院校动态 | 北京师范大学发布“2025 冬芽计划” 助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建设

日前，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心理学部的专业优势和学术科研资源，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为特色的师帆心旅心理成长中心开业，提供针对儿童、青少年、家庭的个性化心理咨询服务。“2025 冬芽计划”服务项目同步发布，旨在针对儿童青少年厌学拒学问题，在经实证有效的系统化服务模式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专属服务方案。

北师大心理学部资深教授林崇德表示，师帆心旅心理成长中心要坚持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将一代代北师大心理学人的殷切期望转化为构建高水平心理健康社会服务体系的动力；要以提高国民素养为目标，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切实做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副主任黄长群希望，“2025 冬芽计划”服务项目和师帆心旅将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持续建立基于实证的心理服务项目和可复制推广的长效机制，推动“家校医社”多方协同构建健康中国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北师大常务副校长王守军表示，师帆心旅心理成长中心将聚焦教育核心需求，强化协同合作，创新发展模式路径，推动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社会服务与行业标准确立深度融合。他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冬芽计划”，共同编织学生心理健康“防护网”，守护广大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仪式上，北师大心理学部专业实践基地正式揭牌，乔志宏、罗良、樊富珉、伍新春等专家受聘为中心顾问。北京师道心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杰代表师帆心旅心理成长中心向新浪扬帆公益基金捐赠心理健康测评项目。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院校动态 | 大连理工大学：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

在音乐博物馆聆听曾侯乙编钟的空灵意蕴，在馥郁的香气中体验传统香道文化的风雅之美……这是大连理工大学“科艺融合”美育公开课的课堂。近年来，大连理工大学积极构建“科技赋能人文、人文引领科技”协同育人体系，持续营造美育氛围，以科艺融合赋能高质量人才培养。

大连理工大学制定出台《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积极破解理工科院校人文教育碎片化的难题，着力打造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实践实训体系、素质拓展体系。

“当数学的秩序之美与音乐的感性表达相遇，当工程技术的精确性与艺术的创造性思维碰撞，学生不仅获得了知识，更提升了认知能力。”2025 年新开设的“科技美学”课程负责人王琦教授介绍。该课程由国家级教学名师领衔，联合 10 余个学院、50 余位教师共同授课，汇聚文、理、工、医、艺、体等多领域师资，精心打造了“数学之美”“弦动之美”等特色教学模块，结合教学互动、专题研讨与项目实践，推动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吸引 200 余位本科生以及硕博研究生参与。

近年来，该校持续加强美育教育体系建设，在培养方案中设置美育教育模块，形成“艺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艺术审美体验+艺术专项特长”的新范式，以“科技人文双向赋能、交叉融合引领创新”为核心理念，持续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大连理工大学每年举办百余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邀请国家级院团、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广泛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学生艺术团专场演出、“文苑”系列展演，连续举办“峰岚杯”文艺大赛、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等活动。

（来源：《光明日报》2025 年 9 月 18 日第 8 版）

院校动态 |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秉持“德业双修，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服务现实”的理念，积极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经过 10 多年实践，建立起“守先待后、德业双馨，团队赋能、导师领衔，教研相长、知行并进，实践导向、五维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培养理念创新 厚植文化自信

学科教学团队将“价值引领”与“实践导向”贯穿培养全程，通过开展中华优秀文化专题研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等活动，引导研究生领悟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自觉肩负起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历史使命。师生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开展“国学大讲堂”等活动百余场，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转化为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行动，实现了“理论灌输”向“实践赋能”的跨越。

指导模式创新 凝聚育人合力

学科创新构建“团队培养机制下的导师责任制”，形成“一人一策+集体智慧”的指导模式，为每名研究生配备“学术导师+实践导师+就业导师”，覆盖育人全流程。教学团队拥有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和主要专家、省级优秀社科专家、优秀研究生导师、教学名师、青年骨干教师等人才，多次应邀在国内外知名哲学院校访学与交流，先后获得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湖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等荣誉。

教学方式创新 拓展育人场景

学科打破传统课堂边界，构建“史类课程+专题课程+导读课程+实践课程”的立体化课程体系。在理论课程方面，开设“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与人工智能”等专业课程与交叉学科课程，定期邀请知名学者开展讲座。在实践课程方面，在长沙、岳阳等地打造了 10 余个国学研修与道德实践基地，累计举办“国学读书会”等活动 1000 余次。每年组织研究生赴岳麓书院等地开展“游学实践”活动。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教师指导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规范意识与创新意识。定期举办“景德论坛”等活动，形成“导师指引—学生主导—校内外互动”的学术研讨机制。近 3 年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会议 50 余次，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

评价体系创新 完善育人导向

学科创设“品德·思想·知识·能力·职业”五维评价体系，其中品德评价关注学术道德与日常言行，思想评价考察文化认同与价值观践行，知识评价考核经典诠释与跨学科整合能力，能力评价聚焦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成效，职业评价跟踪就业质量与行业贡献。

在新的评价体系下，研究生综合素养显著提升，在国家级、省部级征文比赛、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创新项目等方面多次获奖。

（来源：《光明日报》2025 年 9 月 18 日第 3 版）

院校动态 | 山东大学坚持“三个聚焦” 加快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

山东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引领，聚焦育人功能强化、育人模式创新、育人评价改革，持续构建面向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助力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一、聚焦育人功能体系建设，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格局

（一）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加快推进学科专业转型升级，近年来，累计建设 20 个战略新兴专业，调整 37 个专业，专业重组超 40%。打造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纪检监察学院等，增设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智能医学工程等专业，新增人工智能、核科学与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等一批学位授权点，推动传统学科现代化转型，扎实培养国家急需人才。

（二）构建联培共育生态。推进培养主体贯通协同，发挥泰山学堂、齐鲁医学堂、未来技术学院等“六堂一院”引领作用，加强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强基计划等的统筹衔接，构建“学堂+学院+大平台”联动融合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按照“通识+专业+实践”的模块化课程设计理念，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等课程体系建设，建立本研课程学分互认机制，鼓励获得推免资格本科生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提前进入科研团队，支持教师将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融入教学，推动教学科研深度融合。

（三）拓展专项培养空间。依托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国优计划”等重点人才培养项目，深入整合优质办学资源，加快扩大专项育人规模，各专项博士生招生占比达到 46%，提升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力和贡献度。以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为载体，与 15 家央企合作实施人才联合培养专项，牵头组建区域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聚力推进集成电路、半导体等“卡脖子”技术攻关，提升产学研协同育人成效。

二、聚焦交叉育人模式构建，重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一）打造交叉育人载体。聚焦数据科学、智慧工程、智慧医学等前沿领域，创建实体

化运行的学科交叉中心，同时按照“总—分”架构分批建设学科交叉分中心，形成以人工智能底座技术为基础，以智慧海洋、数字空天、智慧国家治理、大健康前沿交叉研究等分中心为支撑的“1+8”交叉育人体系。完善“学校主导—分中心主建—团队主责”的交叉中心建设运行责任机制，加强在政策、规划、督导、评价、服务等方面的协同支持，一体推进学科培育、学生培养、导师发展，构建学科交叉育人“特区”。

（二）建强交叉育人队伍。深化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师资交流，畅通校内外跨学科导师选聘渠道，每年遴选 40 支导师团队，提供 200 个交叉专项博士生指标，引导搭建战略聚焦性强的跨学科导师团队。定期分析导师团队跨一级学科和跨学科门类的趋势走向，依托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和研究生导师发展中心，构建“全员覆盖、全周期贯通、全场景支撑”的教师发展赋能平台，全面增强教师交叉育人能力。推行校企“双师制”，健全企业核心技术人员参与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等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制度规范，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升的师资保障。

（三）完善交叉育人机制。设置集成多学科资源的“揭榜挂帅”人才培养项目，建立“发布项目指南—交叉导师团队申请—导学团队共同解题”的项目制集成攻关机制，引导育人模式向多元交叉、大跨度方向发展。着眼学生全面成长和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建设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流、海洋考古等跨学科“微专业”60 余个；打造“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鼓励学生在攻读基础学科博士学位期间，同时攻读应用技术学科硕士学位。完善重大合作项目与重大合作成果多边认可、多边共享、绩效共同计算制度，引导跨学科跨学院跨机构的深入科研协作，增强多主体交叉协同育人动力活力。

三、聚焦人才评价体系改革，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

（一）创新多元评价办法。全面落实“五育并举”人才培养要求，实施德育等级、学业水平、创新思维、科研能力、后续培养单位反馈等多维度长周期评价，探索建立基于“核心素质—高阶能力—战略贡献”的拔尖创新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推出重大装备、设计方案、技术标准等 7 类实践成果等效替代学位论文的实施细则，并通过加强企业导师库建设、完善“成果认定—报告评阅—答辩与学位授予”等关键环节的校企联合把关机制，构建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全流程质量保障体系，为学生多元化、个性化成长开辟全新空间。学校首届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硕士生凭借“非球面树脂光学镜片精密胶合技术研究”的实践成果报告，顺利通过了毕业答辩，成为全国首批、山东省首位以实践成果获得硕士学

位的毕业生。

（二）强化评价过程管理。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评价的多元主体参与，加强职能部门和培养单位紧密协同的校内自评机制建设，定期开展专家、校友、企业、专业机构等第三方评价，常态化组织人才社会需求、用人单位反馈、学生就业后发展状况等跟踪调研，提高人才评价的全面性和针对性。健全以常态化数据监测、年度报告等为基础的评价结果运用，加大问题反馈、原因诊断、建设指导、整改落实等工作力度，深化与培养单位人事编制、绩效分配、学科建设经费等资源要素配置的协同联动，形成评价过程管理闭环。

（三）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画像等技术方法，整合学生学习过程、科研活动、实践成果等多源异构数据，开展学生成长特征动态分析，持续提升人才评价的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数据驱动的智慧管理“驾驶舱”平台，推动人才评价结果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和各环节的实时动态融合，并面向学生提供专业知识问答、学习路径智能规划、就业方向匹配、特色资源推荐等个性化支持，面向职能部门和培养单位提供培养方案设计、专业评估、教学评价、资源配置等辅助决策，助力学校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来源：教育部简报〔2025〕第 26 期）

高教研究

高水平大学培养研究型卓越中学教师的路径探索 | 谈哲敏

摘要：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是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客观需要，要抓好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借鉴先进经验这“三个关键”。南京大学通过多学科融合、多体系互嵌、多组织协同，探索“三维一体”培养“研究型卓越中学教师”的教师教育新模式。未来，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教师教育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推动数智赋能，构建智慧教师教育新形态；融通“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培养面向未来的卓越教师，加快构建开放融合、智能高效、富有生命力的教师教育新范式。

关键词：高水平大学；教师教育；卓越中学教师；教育强国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工作，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

母机，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高水平大学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主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改革创新、担当作为，加快推动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背景与意义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中，教育发展面临着形态、性质、内涵、标准、作用等多个方面的变革诉求。一方面，立足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另一方面，面向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各种复杂问题的挑战，亟需重新思考为什么学习、怎样学习，以必要的知识和创新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1]。直面新使命下的人才培养需要，教师素质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教师教育需要随变而新。教师队伍建设质量关乎教育事业发展成败，关乎教育强国的根基。必须加快推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让教师教育成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基点”与“龙头”的关键通道。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有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在拔尖创新人才大中小一体化贯通培养亟待破局的背景下，高水平大学在学科、师资、生源等方面的优势，对于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

当前，支持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探索中国特色教师教育道路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为教师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等系列政策陆续出台，鼓励和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卓越中学教师培养。2021 年，“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2022 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把构建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作为具体措施，强调要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推动师范人才培养质量提升。2023 年，“国优计划”启动，开拓了高素质中小学教师培养的新赛道。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把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院校为中小学培养研究生层次优秀教师作为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重要举措。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已经具有广泛的共识和政策基础。

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三个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要抓好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借鉴先进经验“三个关键”。

1.遵循教育规律：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之“道”

培养优秀人才，必须掌握规律。教育规律是教学内部诸因素之间、教学与其他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性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当前，教育界普遍认可并遵循着教学过程的四大基本规律，即，间接性规律、双边性规律、发展性规律和教育性规律。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些教学过程规律的学习者，能够更加可能和快速地成长为培养别人具备这些特质的教育者。例如，在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的规律方面，高水平大学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前沿的学术探究；在体现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统一的规律方面，高水平大学学生可以学习到更多名师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在促进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统一即发展性规律方面，高水平大学学生可以获得更多发展智能的学术机会。高水平大学通过融合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其中，协同优化提升学科建设、培养方案、教材设计、学生管理等各领域、各环节，形成体系化的教师教育格局。通过“教育学科”与“学科教育”一体化发展，促进学术性和师范性融合，以崇高的精神涵育教师、以深厚的学问滋养教师，培养师者之范、学者之范、德者之范的“大先生”。

2.扎根中国大地：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之“势”

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在我国曾经出现过“三次浪潮”[3]：第一次浪潮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高师改大”，既包括了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师范大学”，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也包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为综合大学，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第二次浪潮是抗战期间国立师范学院的兴办。为应对抗战期间对于更多数量、更高质量中小学教师的需求，1938 年成立了 11 所国立师范学院，除了 6 所独立的师范学院之外，还有 5 所师范学院附属在顶尖大学之内，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中央大学的师范学院。第三次浪潮是以南京大学等举办教师教育为先导、以国家启动实施“国优计划”为标志，综合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或教育学院推动教师教育。2019 年 10 月 20 日，南京大学在我国高水平大学中成立了第一个教师教育学院——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简称陶院）。次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教育学院。在此前后，仅江苏省内就有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苏州大学与地方政府共建师范学院。在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三次浪潮”中，南京大学是唯一连续三次领衔改革的高等学府，这也是南京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势”之所在。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是对国家、社会、学生需要的有力回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对多样、特色、优质教育的需求。高水平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交汇点，通过发挥自身影响，可以调动多方主体和资源体系，引领并促进各级各类教育要素的高质量流动、整合与发展，强化国家整体教育发展的人才支点。

3.借鉴先进经验：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之“术”

“寓师范于大学”，发展开放式的师资培养模式，是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普遍做法。在 THE（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QS 世界大学排名）、ARWU（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US News（《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等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除几所单独设立的师范大学以外，位列“教育”专业百强的大学几乎全部是高水平大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学科水平的高低大体代表着“师范教育”的强弱。教育学科的排序与教师教育的质量之间虽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教育学科强的高水平大学在专业学院的加持下，其教师教育水平必然水涨船高。高水平大学拥有齐全的学科门类、雄厚的师资队伍、优质的高考生源、浓厚的研究氛围和广阔的交流平台。在博耶看来，大学的学术分为发现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大学的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也是创造知识、扩展知识的过程， 教学是师生共同发掘新知、启迪思维，引领以求知为目的的探究性学习活动[4]。因此，将教师培养置于开放多元的学术生态中，可以引导学生将学科知识与对实践的反思以及对工作的研究能力相结合，发展合作学习、整合学科知识、运用现代科技学习与交流的能力等[5]。

“三维一体”：培养“研究型卓越中学教师”的实践探索

从教师教育理论视角来看，教师专业发展不仅依赖于学科知识与教学技能的简单叠加，更是在多维系统中通过协同整合实现专业身份建构的复杂过程。研究型卓越中学教师的成长需实现学科知识、教学能力与职业情怀的深度融合，并在真实教育情境中通过持续反思实现专业自主性的发展。同时，基于“教师教育共同体”理论，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必须打破大学、中小学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组织壁垒，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构建开放、互嵌的培养生态。

南京大学的实践正是对这些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回应。2019 年，南京大学陶院成立，开始

学科教学（物理和英语）领域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探索与实践，成为高水平大学培养卓越基础教育教师之嚆矢。2023 年，作为全国首批试点高校，南京大学开始实施“国优计划”，培养对象扩大到数理化生四个学科的理工科非师范类硕士，通过创新选拔方式、优化导师指导模式和构建特色课程方案，培养具有深厚教育情怀和高尚道德操守、广博学科知识和先进教育理论、创新思维品质和持续研究能力、强烈变革意识和不断进取精神的研究型中学卓越教师。2025 年，南京大学入选了教育部“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试点单位”。

聚焦“如何更好地发挥高水平大学的优势”这一核心议题，南京大学致力于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如何充分发挥高水平大学多学科优势，促进教育学科与其他基础学科的深度融合，支撑“研究型中学卓越教师”的培养需要？如何优化整合不同类型的教师教育项目，形成功能互补、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系，为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发展赋能？如何实现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与育人机制的创新变革，激发教师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中的多重活力？经过六年多持续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迭代改进，南京大学现已形成“多学科融合”“多体系互嵌”“多组织协同”的培养框架，凝聚成学科维度、体系维度、组织维度“三维一体”的运行机制，着力破解传统教师教育中学术性与师范性割裂、理论与实践脱节、培养主体单一等问题，为研究型卓越中学教师的成长提供持续的系统支持。

1.多学科融合，形成学科矩阵的协同联动与融通

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最大掣肘是师资不足，在课程开设、导师选配等方面存在困难。南京大学坚持学术驱动、学科融合，形成由物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共同组成的多学科育人矩阵，在奠定教育教学知识的基础上，强化跨学科素养、学术探究能力的培养：一是开设“三类课程”，将教育学课程（通）、学科专业课程（专）、行业实践类课程（行）视作“一盘棋”，打造“通专行”合一的课程体系，完善专业课程开放制度，切实保障学生选择权。二是实施“三导师”，聘请教育学科、相关专业学院、中学等三方面专家共同指导学生，并设立交叉学科研究项目，重点推动中学教师开展教案设计、课堂观摩等实践性导学，举办“中学名校长讲堂”等，加强对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支持。三是建设联合实训基地，挂牌“学科教学英语语言技能训练中心”“学科教学微格教室”“学科教学（物理）实训实验中心”，强化学生实习实训条件建设。南京大学通过构建学科矩阵、实施“三类课程”与“三导师制”，创设“多维融合的专业学习环境”，促使学生在多元学术共同体中实现知识的跨界整合、身份的自觉认同以及能力的协同发展，为破解学术性与师范性二元对立的传统困境提供了实践

路径。

2.多体系互嵌，实现多样化教师教育体系的同频共振

坚持“知行合一”观念，南京大学鼓励优秀学生加入基础教育教师队伍，面向全体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创设“师陶计划”和“行知计划”，通过贯通性学习形成对教育及相关学科的认知，并在教育实践中形成教育反思、提升教育洞察、改进教育行为，支撑学生成长为“反思性教育行动者”。“师陶计划”于 2023 年启动实施，旨在为有志从教的全学科全学段的学生提供教育学相关课程修读、中学实践机会。学生在完成教育理论课程、系列讲座计划、定点中学教育实习并通过考核后获得结业证书。该项目拓展了教师教育的受益面，帮助未来计划进入教育行业的非师范类学生开展知识能力储备与实践锻炼，以更快更好适应新教师岗位要求，也为“国优计划”预选和培育了优质生源。“行知计划”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通过教学技能竞赛考察提升学生一线实践与教学能力。竞赛内容包括模拟授课、教学技能、教学基本功等多维度内容。2021 年以来，已有 1 名学生获得国家级教学能力竞赛二等奖、7 名学生获得省级教学能力竞赛特等奖及一等奖。南京大学“多体系互嵌”的实践模式构建了“理论浸润—实践参与—竞赛激发—反思提升”的螺旋式成长路径，不仅拓宽了高水平大学教师教育的覆盖范围，更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从“知识传递”到“实践建构”的范式转型，为培养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反思性实践者提供了重要的体系化支撑。通过“师陶计划”中的定点实习和“行知计划”中的教学竞赛，学生得以从教育实践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在真实的教育共同体中通过参与和反思建构专业身份。

3.多组织协同，搭建“政府—高校—中学”人才培养共同体

南京大学坚持“开门办教师教育”，构建“政府—高校—中学”开放、多赢、协同、联动的培养生态。与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镇江市等地方教育部门合作举办人才专场招聘会，开辟学生到基础教育从教的通道。强化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等开展战略合作，建设“研究生工作站”，构建“订单式”培养机制。深入探索“高中—大学”贯通育人，与江苏省内外 186 所优质中学达成合作意向，与近 50 所高品质示范高中联合建立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形成专项人才输送通道。深度参与教育部“双名计划”、江苏省“苏教名家”等培训项目，打通“职前培养—职后提升—学历进阶”成长通道，向合作中学教师开放高层次学历学位提升渠道，设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点，聚焦培养高层次教育行业领军人才。搭建职后发展支持服务体系，立足教师教育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

培训基础教育领域校长和教师 5000 余人。开展“西部行知计划”科学教育公益培训项目，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西部。南京大学构建的多组织协同培养模式突破了传统教师培养中的大学单一主体的封闭格局，通过多组织、多层次的制度性协作，构建了一个开放、联动的教师教育生态系统。一方面通过政府、高校与中小学等多元主体的权力共享、资源互补与责任共担，实现教师教育供给的优化与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大学、中小学、教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伙伴关系，为教师提供了贯穿职前职后、理论与实践交织的持续性专业发展支持。这种多组织协同的共同体不仅有效促进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更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教师教育新机制。

高水平大学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变迁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水平大学理应承担起创新教师教育路径的使命与责任。改革的可持续性和规模效应需依托制度化的政策支持、技术赋能的文化建构以及本土化与国际化互鉴的机制设计，以实现从高校自主探索向国家体系构建的跃升，在更大范围建立更为广泛的目标共识，实现从具体、孤立的高校项目试点向制度化、规模化、可持续化的转变。这就需要进一步在国家战略层面强化顶层设计、深化技术赋能、拓展国际视野。

1.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教师教育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

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绝非师范专业的“加法式”扩展，而是涉及教育治理体系、高校办学目标定位、跨部门资源协同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变革，需要建立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协同机制为支撑的长效保障体系。第一，要完善财政支持机制。通过设立“高水平大学教师教育专项基金”等方式，扩大预算规模，重点支持高校开展跨学科融合课程、实践项目等核心育人资源建设，支持高校深度参与中西部地区教师培养工作。第二，要建立健全评估体系，把高水平教师教育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目标内涵，建立涵盖过程性监测、结果性评价、社会反馈等在内的评估指标体系，将评估结果与专项基金分配、招生计划、学位授权等挂钩，确保培养质量与基础教育改革需求同向同步。第三，打通人才服务通道，推动高校、中小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就业意向提前对接、编制指标定向预留、入职培训无缝衔接等机制。对通过“国优计划”“强基计划（师范方向）”录取的学生，实行“入学即签订就业意向书”，在中小学招聘中预留一定的岗位额度，建立“基础教育人才专项编制”等制度，对赴乡村、边远地区任教的毕业生给予学费补偿、安家费支持与职称

晋升倾斜，打造“从校园到讲台”的全周期职业发展保障链条。

2.推动数智赋能，构建智慧教师教育新形态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教育变革的深度融合，正推动教师培养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标准化培养”向“个性化成长”转型。高水平大学应充分发挥在信息技术、数据科学、智能算法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以数智技术支撑教师教育变革和创新，主动抢占智慧教师教育发展的“制高点”。第一，探索建设智慧教学中心，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国家级精品课程、特级教师教学案例库、优质微课资源等，打造集虚拟课堂演练、教学情境模拟、AI 辅助诊断、个性化学习路径生成等于一体的沉浸式智慧教学中心。第二，加强数字素养培育，将数字教学能力作为师范生核心胜任力指标，打造“智能教学工具开发”“数据驱动的教学设计”“教育技术应用”等课程，组织开展“智慧教学工作坊”“AI 教学创新大赛”等，全面提升师生数字化教学实践能力。第三，构建跨区域资源共享联盟，由高水平大学牵头，联合地方政府与优质中小学，共建“跨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共享联盟”，建立优质资源池、区域调度机制、均衡发展保障三级联动体系，推动优质课程、教学案例、实训平台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辐射，助力教育公平。

3.融通“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培养面向未来的卓越教师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交织的背景下，教师教育必须坚持“扎根中国大地”与“面向世界未来”双向发力，既传承中华优秀教育传统，又吸收国际先进经验，锻造出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民教育家。第一，深植中华文化基因，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教师教育传统，系统融入“中国教育思想史”“传统师道文化”“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等专题内容，邀请全国模范教师、教育家型校长开设“大先生讲坛”“名师成长之路”系列讲座，完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紧密结合，坚定师范生理想信念。第二，深化国际化合作机制，建立“教师互派、学生交换、联合科研”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机制，常态化组织跨国联合教研活动，围绕课程改革、评价标准、教师专业发展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对话。定期邀请国际知名教育学者讲学、开设工作坊，拓宽师生国际视野。第三，讲好中国教师教育故事，借鉴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经验，加强对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规律性研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模式”，推动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快速传播，增强我国在全球教师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不仅是响应教育强国战略的

必然选择，更是高等教育功能拓展与价值回归的重要体现。高水平大学要在更高的格局定位、更大的使命担当中立足“国之大者”，以制度保障为根基、以数智赋能为动力、以文化自信为灵魂，加快构建开放融合、智能高效、富有生命力的教师教育新范式，在先行先试中为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UNESCO.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 Executive Summary[R].Paris:UNESCO，2021.

[2]谢维和.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研究，2022（4）.

[3]王运来，高慧敏，谢雯.试谈综合性大学开办教师教育的三次探索[J].江苏高教，2019（12）.

[4]Ernest L. Boyer: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M]. Newl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5]张佳伟，卢乃桂.寻找学术性与师范性融合的空间——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发展教师教育的优化路径[J].教育研究，2023（2）.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 年第 17 期）

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下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动因、内涵及路径 | 申国昌 周璇

摘要：建成教育强国的龙头在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任。加强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对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进而促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提升可及性又是教育强国建设对高等教育公共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其基本内涵包括服务权责有制可依、服务资源供需适配、服务过程公平合理与服务生态智能升级。政府作为服务主体，应立足可及性的四大内涵精准施策，通过建立健全服务制度、弥合服务供需缝隙、加强服务监测评估、创新数字服务生态等举措，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为建成教育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教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可及性

（来源：《现代大学教育》第 5 期）

在“学习化”浪潮中重新发现“教”的价值——对高等教育学习化现象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 柴楠 柯毅婷

摘要：“学习”一词在今天的教育研究、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中越来越成为流行的概念，教学的地位则相对下降，“教育话语”逐渐向“学习话语”转变。学习化浪潮造就了无处不在的“学习话语”，它一方面通过主体的自我化而使教学的伦理性遭到解构，另一方面通过对教学目标的“预测”和“设计”而规避教育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此同时，对“预期结果”的追逐和“既定标准”的遵循使教学难以再触及学生的精神世界，从而在根本上限制着“教”之完整价值的实现。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重新从“好教育”问题出发，对教育本身予以省思。高等教育不应该被窄化为“学习”，而要看到教学促成个体精神内在开放之可能性与必要性，正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多层面的不确定性，从而赋予教育以“美丽的风险”。高等教育需要重新发现教学的价值以实现教学的超越性，并形成自我与他者共生共在的教育愿景。

关键词：教育学习化；主体性；教育风险

在当下的教育场域中，我们正在通过学术性的研究和日常性的实践完成“学习话语”对“教育话语”的替代，并以“学习”重新定义“教育”。荷兰教育学家比斯塔将这种现象称为教育的“学习化”（learnification）。“学习化”理念将学生称为“学习者”，将学校称为“学习场所”，教师则被视为是“学习的辅助者”[1]。基于这种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学”相对于“教”始终被赋予一种优先性，教学需要通过显性直观的学习结果来验证自身的有效性。“学”与“教”之间这种因果式的关系构建，将教学活动简化为追求最优学习结果的模式化流程。然而，以“学习效果”的测量为标志的“有效教学”是否是值得追求的？“学习”是否必然有益？比斯塔通过深度剖析富有时代气息的教育问题，力图使学校教育摆脱“学习文化”和“测量文化”的浸染，同时警示人们强势的“学习话语”对教学实践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本文根据比斯塔的教育思想对这种风靡于时代、盛行于学校的“学习文化”予以反思，理清“学习话语”对教学实践可能产生的诸种影响，最终实现教学在“规范性”和“复杂性”上的实践回归。虽然这种回归会让教学过程变得无法预料，使教学始终面临种种“风险”，

但它以开放之姿态去唤醒学生，促成个体的主体化，并最终指向人性的自由，成就“美丽的风险”。

一、从“教”到“学”：教育学习化浪潮的形成

“学习话语”的广泛流行使人们遗忘了对学习本身的判断和思考，它使公众相信，学习在个体生命中发生得自然而然、不容置疑，“学习化”也在这一过程中演变为一种时代性的浪潮。

（一）学习化浪潮的缘起：新教学理论的兴起与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广

伴随着 20 世纪以来各种新学习理论的兴起和终身学习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学习话语”完成了对“教育话语”的时代重构。首先，学习化的兴起源于新教学理论的持续发展。进入 20 世纪，教学理论通过吸纳学习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而将“学习”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2]，从而在根本上弱化传统教学理论中“教”相对于“学”的决定性和引领性。斯金纳的程序教学将“教”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完成从 teaching 到 instruction 的颠覆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不难发现，学习心理学的介入在使教学理论自身开始科学化转向的同时，也推动着“教”“学”关系的逆转和师生角色的转换。然而，真正使学习的重要性超过教学的是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兴起，人本主义者以“促进者”代替传统意义上教师角色，建构主义则明确把“学生”和“学习”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责无旁贷地为学生完成各项学习任务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些新的理论力图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对“学”的支配与控制，通过将“学习”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把学生从被控制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 21 世纪，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生物信息科学的介入，旨在探索人类内在学习机理的学习科学获得蓬勃发展，“学习理论”逐步走向前台，而“教学理论”则日益退隐。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核心任务不是如何教，而是如何促进学生进行有意义的深度学习，教师的角色也彻底从“讲台上的圣贤”转变为“身边的指导者”。“学习”越来越作为一种强势的理论话语，重构着人们对“教育”内涵的时代认知。

其次，学习化浪潮的产生还源于终身学习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如果说 20 世纪以来的新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在微观教学领域推动着学习化浪潮的形成，那么终身学习理念则使这股“浪潮”开始向全社会蔓延。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学习：财富蕴藏其中》开始用“终身学习”取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泛流行的“终身教育”概念。“终

身学习的提出旨在建立各种不同形态的学习机制，增进个体参与学习活动的热情，激发个人向上，提升思想、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其最大特点是高扬学习者的主体性。”[3]“学习”对“教育”的替代表征着观念的变迁，也意味着时代性的更替。1998 年，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在《全民终身学习》中明确指出，“终身学习的目标涵盖了每个人一生的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同时，社会成员必须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以向知识经济过渡”[4]。一个全民学习化的时代正式到来，相应地，“终身学习”也被表述为个体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的指导性原则，并内化于社会成员日常性的思考和行动之中。

终身学习使学习超越了学校的边界，学习不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伊利奇甚至认为正是学校阻碍了“真正学习”的发生，他通过“废除学校”的激进理想将“教育与学习”之间的天然联系彻底撕裂[5]。尽管他基于“无边界自主学习网络”的“学习乌托邦”构想在当时未能成为现实，然而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学习彻底逾越学校边界不再是一种幻想，学习化社会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而教育学习化也必将在技术的加持下越走越远。

蓬勃兴起的学习理论、风靡世界的终身学习运动共同推动了“学习话语”的形成，而强势的“学习话语”对人们的教育观念以及教育行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学习化浪潮的最初力量。教育“学习化”不仅体现为“话语”的泛滥，更通过与“测量文化”的联姻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

（二）学习化的现实动力：测量文化基础上循证逻辑

现代教育开辟了测量评价的时代，它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以数据测量为手段，坚信“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数量，凡是有数量的东西都可测量”[6]。如果说新理念的不断涌现使“学习”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教育话语，那么测量文化则使这种“话语”逐步走向“现实”，成为教育学习化的现实推动力量。

首先，测量文化使“学习”成为高等教育进行自我确证的基本依据。测量文化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超越教育主体的主观臆测，并通过以测量数据为表征的科学证据抵制一切主观和偶然的因素，使教育结果更具科学性。然而，对客观证据的过度依赖让人们越来越把数据当作衡量教育有效性的核心依据甚至是唯一标准，相应地，大学教育的任务也被视为“学习结果”的高效生产[7]8。如此，“教育”便不得不通过“学习结果”来获得自我的确证，学习不再是

关于“行动”和“过程”的描述性概念，而成为一个针对“结果”的评价性概念，教育是否发生的判断依据在于面向学习结果的测量数据是否产生积极的变化。测量文化使“教”始于“学”、为了“学”，并在测量观念的引领下，不断地依据学习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善。这种基于测量文化的教育是“数据至上”的教育，数据评估为学校教育实践的改进提供了事实证据支撑，相较于个人判断，它是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评判方式，更能直观地反映教师的水平与学校的质量。于是，数据化的学习结果不仅构成教育自我确证的依据，同时也是教育优劣的基本判据。

其次，测量文化使“学习”成为大学生自主性发挥的唯一领地。事实上，教师或学校对学习结果进行数据化的测量并无不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可避免。然而，“数据至上”的测量文化使学校通过测量指标的设定把控教育中的一切，并试图以数据的方式衡量学习结果的全部内容。这些量化数据既表征着学生在学校排名中的位置，也彰显出个体的学习能力，并据此进行明确的等级划分。在这一过程中，执行者和参与者只需按照既定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进行即可，学生不用去为测量结果做出任何价值性的思考。当一切都处于一种被支配和控制的状态时，学习对学生而言便是他们能够最大限度行使自主权的唯一领地，学生所能做的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来填补现实与未来的差距。

最后，测量文化通过“有效”观念的价值化而将“教学”重新定义为对“学习”的促进。测量的目的在于推动教育的科学化，而基于这种测量文化的“循证教育”则被视为教育科学化的新阶段。测量重视结果绩效，循证强调因果逻辑，于是，教育便在“测量”以及作为测量之结果的“证据”的共同见证之下使自身建基于严格的科学证据之上[8]。沿着这种测量文化的路径，好的教育就是有效的教育，就是行为的输入与学习结果的输出之间的完美匹配。为了获得这种“好”的教育，教育过程不得不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学校利用各种测验结果和预设的成绩指标的好坏来衡量教学是否合格、学习是否达标。很显然，基于测量观念的“有效性”不再仅仅作为一个评价性概念，而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引领着教育行动的方向，教育目标被确立为培养基于测量指标获得高分从而被社会认可的“优秀学生”。但是，测量作为一种量化的手段只能测量它“能够测量的”，而非“应该测量的”。换言之，我们所真正测量的并非我们真正重视的，而只是在“测量我们能够轻易测量到并且最终能评估的东西”[9]。而基于测量指标造就的“优秀学生”只是一个个如此相似、可以被随时替换的人，他们身上的那种“我”之为“我”的独特性在显性测量中被一步步消磨殆尽。

（三）学习化的现实表征：“教”“学”关系在实践中的逆转

当学习的收益超越教学所带来的价值时，人们就会对学习愈发重视，从而使“教”在课堂中的地位降格。教学与学习的关系也在这场价值危机中失去平衡，甚至走向对立，“教”相对于“学”越来越成为辅助性的存在，并认为“教师再也不能把知识传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把精力放在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上，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把教学的中心放在如何促进学生‘学’上，从而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10]。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我国始终将“少教多学”作为课程与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强调减少教师的授课时间以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11]。于是，在长期的改革实践和理念渗透中，人们逐步对“讲授”与“学习”两种教学范式形成一种共识性的认知：讲授范式意味着教师对学生的单向灌输，因而是应该抵制的；学习范式则意味着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因而是应该提倡的。

教育领域的这种“学习化”改革完成了中国教育在观念层面的变迁和政策层面的规范，并以“学习”引领和推动着教育领域的“话语革命”。然而，观念的变革和话语的转型并没有转化为学校的教育行动。在实践领域，教师的教学行动并没有按照学习中心的观念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相反，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占据着教学活动的核心位置，“重学轻教”的学习化现象似乎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事实上，话语上的“学习化变革”和实践上“对教学的坚守”正在撕裂着中国学校教育的价值生态。如果说发生在中国课堂中的“传统教学”始终恪守着保守主义的立场，新课程改革所彰显的学习理念代表着一种进步主义的选择，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开辟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按照进步主义的方式重构我们对教学的理解。之所以要“重构”，是因为发生在中国课堂中的“教”并非是我们所期待的“教”，而是一种通过结果设定而进行的控制性的教。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教”很大程度上是“致学取向”的教，“教”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习得知识”“学会技能”。在教学过程中，不是由教来引领学，而是根据要学习的内容（甚至是考试的内容）来确定教的内容，即“以学定教”。这种“以学定教”的教学实践通过“教”让学生更扎实地“学”，而教的主导地位只体现在为学生提供预设的知识，因此是表面上的和形式性的。

理念层面的“重学轻教”、政策层面的“多学少教”和实践层面的“以学定教”共同促成了中国教育领域“学习化”的基本现实。不过，这里似乎呈现着两种不同的“学习化”：一种是在学习型社会的时代浪潮下、在教师主导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我应该学”，它把学习看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事件；另一种则是基于现代学习理论形

成的“我该如何学”，即学生应该是在教师主导和控制下进行学习，还是以自主探究性的方式进行学习。但是，“学习化”并非是要在“我应该学”与“我该如何学”中间二者择一，“学习化浪潮”既意味着“应该学习”的话语引导，也意味着“如何学习”的观念支配。“学习化浪潮”的核心要义在于“学”对“教”的限制和约束，把“教”视为支撑学习的辅助手段，教师则从讲台上的教学智者转变为学习资源的提供者。于是，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两种截然分明、相互对立的教学理念在当今的中国学校教育中携手并行，共同推动着教育学习化浪潮的到来。

二、“学习化”的三重隐忧

20 世纪以来，新教学理论的兴起、终身学习理念的蔓延、测量文化的现实推动等共同促成了“教”“学”关系在学校教育中的逆转，“学习化”也在跨世纪的历程中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浪潮。今天，学习观念是如此流行，以至于人们对学习话语早已习以为常，然而正是这种流行的观念和习以为常的话语为教学带来了种种隐忧。

（一）主体的自我化：教学过程的伦理解构

现代人为什么愿意费尽心力让子女到学校接受高等教育？这首先是因为只有通过高等教育才能具备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其次，在今天，学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特定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合格成员，让个人符合社会秩序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只有通过高等教育才能让学生成为独立的主体。比斯塔将教育的三重价值分别概括为资格化、社会化和主体化，任何教育实践都必将侧重影响三个领域之一，教学活动就是在这三个价值维度之间寻求平衡的艺术[7]208。在学校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学习化”往往会使学校教育更为重视数据化、绩效化的学习结果，从而更支持资格化和社会化，轻视主体化。然而，“主体化”之于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教育通过“主体化”让学生获得秩序之外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主体化不仅促成资格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而且允许学生成为独立的思想者、实践者，从而通过赋予个体表达独特自我的权利，使教育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也随着他者的卷入而成为一个伦理性事件。“看见”他者乃是促成主体行动的前提，“看见”他者意味着学生愿意将以自我为中心的注意力转移到教师、同学身上，在保持平等的前提下尝试理解对方，给予对方表达和言说的机会，在教学实践中主动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

[12]。在一个忽视他者存在的环境里，学生容易对集体缺乏归属感，同时在同辈之间也缺乏真正的倾听和看见，看待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内在的行动力量。

学习化所造就的主体就是这种自我中心的主体，是个人主义的和自我指向的，而非关系性的和伦理性的。学习化执着于对外在确定性的追逐，从而使学生无法返回自身，也无法敞开心扉地接纳他者。“在这个新的学习时代，学习将逐渐由学习工程所主导，即以学习者为中心，制定面向实践的个性化方案，为学习者提供最优化的技术与方法。”[13]无论是教师要求或引导的学习，还是小组合作式的学习，都从自我出发并回归自身。这种自我中心的主体既是个体化的主体，也是同一性的主体，它以“自我”遗忘“他者”，以“同一”消解“差异”。然而，教学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师生、生生交往的伦理关系，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主体，更需要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主体。

面对这样的伦理主体，真正重要的不是去探究“主体是什么”，而是以一种“存在”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即主体如何在行动中呈现自身？根据阿伦特的行动理论，行动只有发生在他者在场的公共场域之中，个体的生命才有延续的意义。人类事务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要依靠他人的在场[14]。教育行动通过人与人的相遇而将他者卷入自我，并使自我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但这并不会对我的主体性产生丝毫的减损。“真正的主体性观念成立的基点不在于我自己，而在于异于我的他者，具有他性的他者才构成真正主体性概念的前提。”[15]175 也就是说，主体性不是事先就已经存在的，它一定是在伦理关系中展开其内涵的，一定是在责任行为中被建构起来的，正是在责任行为中，主体性得到了“真正的高扬”[15]176。学习化的观念在掩盖了教师之为教师的完整价值和真正使命的同时，又把学生成就的全部责任放在教师的肩上，暗示着学生只是愿意接受干预的对象，而不是能够进行责任担当和思考行动的主体[16]。它让师生在自我中心的学习过程中成为个体性的和同一性的占有式主体，从而完全消解了教学的伦理性，也消解着主体之为主体的伦理责任。

（二）不确定性的规避：在“预期结果”的追求中遗忘“教育的美丽风险”

学习化不仅通过主体的自我化解构教学过程的伦理性，从而消解主体之为主体的伦理责任，同时通过对预期结果的期待和对教学过程的控制而使课堂成为一个封闭的世界，满足于对确定性的寻求。然而，风险之于教学乃是一种必然的存在，遗忘风险、规避风险则意味着对大学教学之开放性、多元性的彻底否定。

高等教育的“学习化”使“学习话语”弥漫于大学校园，“学习必然有益”成为人们不

加反思的共识和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但人们对“学习”的迷恋不是因为学习本身，而是学习带来的结果。为了获得这个结果，不管学生还是教师，都不愿正视那些不可预见的“意外”状况，他们严格按照预设的目标推进教育的每一环节，尽可能让教育安全地运行。规避风险、强调结果的教育氛围使大学教师始终以控制者的姿态和确定性的逻辑来展开日常的教学实践，教师致力于寻找最优的教学方法以快速有效地实现预期结果，学生则在教师预设性的教学范式中成为教学过程中的“听话者”，而非课堂交往中“对话者”。

人们为何想要去规避那些预期结果以外的风险？因为不确定性的教学是不可控的，教师无法确保学生在不可控的情境下能够主动承担起责任，并努力达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表征着目标的不可预设性和过程的不可预见性，然而教学之可贵正在于此，正是这种不可预设性和不可预见性使教学世界始终作为一个可能的世界。风险的存在固然会使教学结果偏离原初的设想，同时也让教学慢慢生长为一种既不安全也不保险的“弱”的存在，但这种“弱”的教学却使学生能够在可能的世界中敞开自我，并在风险的担当中实现与他者的对话。参与课堂便必然蕴含风险，而教学的价值就是在风险中实现的，“一言以蔽之，通过积极的师生交往互动，实现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教学共生的目标，达成师生彼此的成全”[17]。叶芝形容教育不是填满水桶，而是生起一团火焰。如果我们不愿直面课堂中的风险，集结各方力量全力控制、消除这些风险，尽管这么做能成就百分之百安全、无风险的课堂教学，但是教学却在确定性的寻求中不再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超越世界。

允许风险存在的高校课堂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到生命实践中的真正机会，它使学生能以自由之姿态直面可能之未来。风险的开放性使主体的生成变为可能，课堂教学若全然不顾风险，学生就无法主动地参与到自身的生命实践当中，师生关系也将被简化为课堂上短暂的知识存取关系。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教师和学生不能互为光明照亮彼此，不能构成真正的交往，也就不能实现“生起一团火焰”的价值。教学中的“风险”就像加缪眼中的西西弗斯，尽管巨石随时都有滚落的风险，可是西西弗斯却能看清本质，直面风险，每天不懈地推动巨石。教学的过程亦是如此，它必然包含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教师与学生的交流绝非一个从传授到接受的单向过程，而是意义引导、产生、再建构的过程。“教学通过对学生的思想世界的塑造，使其在个体成人过程中敞开出人的超越性的生命意义，唤醒人的生命自觉，产生出一种向善与自由的趋向。”[18]

（三）教育性的消解：“教”之完整价值的遮蔽

学生的成长需要教师积极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引领。然而，以结果为导向的课堂教学使教师始终遵循“预设—完成”的固定模式进行教学设计，并依靠外在约束来展开课堂实践。这样的课堂教学是以教师线性地输出既定知识为方式展开的课堂，尽管教师对教学流程的强势把控可确保学生符合既定的标准，但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禁锢着学生生命发展的丰富样态。教学固然需要一定的模式和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意蕴[19]。教学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更是一个价值性的世界，无论何种形态的教学活动都应指向对学生生命的关怀。“学习化”通过控制过程和预设结果而在根本上消解着教学促进学生整全生命成长的可能性，教学之价值也因此变得单调而贫乏。

相较于促进学习这一目的，大学教学应该有更为崇高的价值理想，它不仅仅要训练学生去适应现有的规则、获得既有的知识，更要在教学实践展开的过程中充分彰显出自身的“教育品性”。大学教学必须以生动而具体的方式，引导学生在生活性和思想性的情境之中面临挑战、获得成长，领悟生命的意义。然而，知识的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意义的丰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学生越来越丧失对生活的意义感受，无法用足够的内驱力来面对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无法依照自我意志做出理性的选择，反而在外在的功利性目的的诱导之下陷于精神的迷茫之中。“教”之本真价值在于为学生提供探寻生命成长的多重机遇，开拓生命意义的多重面向，从而在根本上逃离“为学习而学习”的教育逻辑。

作为一种思潮或理念，“学习化”或许并不反对教学的教育性，以及教师对教学的意义建构。然而，当我们回归现实的教育世界，不难发现“学习化浪潮”虽然在理念层面不断强调学生精神成长的意义，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对学生的内心世界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支持，教学的整全价值始终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在学习化的浪潮里，教师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为预设的目标而做出相应的努力，而教学则在对既定目标的追逐中越来越遗忘其原初的精神品性。大学教育在对“学习”的重视和强调中阻碍着教学之完整价值的实现，教学只是达成特定目的的“功能性”活动，而非促进学生内在完善的“教育性”实践。学生身处教育世界，却感受不到内在的精神充盈，教学的教育性遭到彻底的解构，无法再触及学生的精神世界。重新思考教学的教育性和精神性是对“教”“学”因果型关系的克服和超越，也是对教学价值的实践反思。大学教学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学生能力的提升和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的是为学生打开丰富的生命世界，帮助学生以主体的姿态实现思想和精神的自由。

三、在去“学习化”过程中实现“教”的回归

真正的教学要求师生以完整的生命姿态参与其中，并将客观知识之外的人文性智识带入教育之境。去“学习化”的过程就是教师之“教”的回归过程，大学教学并不是教师面对众多学生而发生的教—学关系的叠加，而要为学生的存在开辟出其他的可能性，让他们主动而勇敢地面对向他们而来的存在于理性之外的事物[20]。当学生能够从教师的教学中汲取营养并将其内化为生命成长的动力，然后从以不同角度进行思考的结果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时，我们将在教育的“美丽风险”中对教育本身产生不一样的想象。

（一）让教学在价值上复归于人的解放

“学习化”课堂强调教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空间，“教”要服务于“学”，相应地，在教育实践中教师的“教”就演变为“伴学”。人们更关注的是“教”的功用性，而非价值性，人们对“教”价值性既少了一份心理期待，也少了一份内在的行动动力。对功用性的强调意味着“学习化”可以生产出具备知识和技能的群体，却难以形成具有独特个性、发起行动并负责的主体。

学生无法单独依靠自身而发展出主体性，而是需要教师引导，伦理意义上的教学实现了从“单向度知识人的规训”转变为“完整大写人的涵养”[1]68-69。这种转变使教学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同时也使教学成为一个规范性事件。过程上的复杂性意味着结果上的不确定性，而目的上的规范性则意味着价值上的开放性，大学课堂自然也就处于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然而正是这种风险赋予学生面向未来可能世界时的判断能力和责任意识，让学生在主动的行动选择中、在对他者责任的回应中成为自由的主体。教育因不可知的“美丽风险”而令人向往，因对个体自由精神的唤醒而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解放”要求学生以个体身份进入与他者共在的教育世界。教师的任务就是为学生创造以自身独特方式进入世界的可能性，促进学生有意识地追求自我生命的可能存在样态。只有如此，教学才能在这种多元、开放、超越的过程中实现价值上的回归。

人的觉醒伴随着主体的解放逻辑，即当出现“一种力量阻碍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条件拥有一个准确理解”时，解放者就要将解放性知识提供给被解放者，以使其获得自由[21]。这种解放逻辑下的教育包括“独白式”与“对话式”两种形式：前者依赖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对等，教师教学的目的在于将原本无知的学生培养成为另一个版本的自己，学生的学习任务是可复制的；后者则是师生合作探究的过程，大学教师的任务在于中断学生可复制性知识的学习，转而创设问题情景，引发对话，帮助学生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

使得学生能够对问题做出回应。然而，这两种理性主义逻辑下的教育解放形式最终都要寻求确定性的真理，依赖于权力主体以外的人。福柯的“越界”实践哲学为无需“强式”学习的解放打开了新的视角——知识与权力共在[1]7。解放的目的在于使我们远离定势思维，让我们意识到学习是教学的可能性之一。福柯的教育解放观促使我们开始看到学习以外的存在，个体生命也能通过经验感知、社会参与而变得充盈，这样的教育是一个开放、充满“美丽风险”的过程。

（二）让课堂在方式上重回“教”的引领

在比斯塔看来，教育是通过交流而运行的，因此是一个意义共享和共建的过程。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教育的“交流”提供了一种恰切的理解路径。杜威指出，师生在相同的教育情境中基于共同的教育目的，却产生了不同的思想与情感，而每一种思想情感都是值得被回应和相互理解的，所有参与者通过充分而自由的交流产生新的灵感。这意味着大学课堂的交流不是简单的“发出—接受”模式，而是通过双方的积极互动和参与来引导事物的意义呈现，从而使交流趋于开放与不确定性，同时也兼具生成性和创造性。

“学习化”使大学课堂中的“交流”演变成学生“向教师学”的过程，而非“被教师教”的过程。“向教师学”是学生把教师视为即时获取的学习资源，以控制的姿态，选择性地自主学习已经存在的知识，是把教师提供的知识带入自己的理解范围及建构方法之中，对知识意义的解释却超越不了有限的程式建构。而“被教师教”的教学方式让我们意识到教学和学习是非对称的结构，涉及思维方式、社会认知和生命经验的差异，此时的教师之教带来的是顿悟的艺术，将不同于一般科学知识的“困难知识”从外界带入我们的存在中。然而这不是提议“向教师学”不重要，而是应该意识到教师角色转变的必要性——从“资源提供型”教师转向“激励启发型”教师。教师作为和学生共同感受生命的体验者，对学生的学习方式选择、学习习惯养成、学习目的和意义认知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被教师教”这一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了对教师主导作用的传统认知，从而为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学生的消极学习，如果教师关注自己提出的问题、学生的需要和反馈，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就是非静止的状态。一个人“被教”和“自学”的体验感是不可能相同的，因为独立于世界之外、无法回应他者的人无法践行真实的“交流”，个体也无法对挑战自我持存的一系列问题有深刻的思考。“被教”建构出的不同于普通知识的人文智识是“学”所不能企及的。“教”的超越性才能真正指向育人价值和素养本位的教育追求，学生才能作为主体对学习做出个人的思考，进而发出行动。

教学对于学习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教学超越了为学生传授确定性知识这一普遍意义。克尔凯郭尔将这种教学的超越性描述为“启示”，以“润物细无声”的育人之道向学生呈现出具有判断力的智识。“启示”不仅意味着“教师给学习者一些他/她不曾拥有过的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他/她辨认真理为真理的条件”[7]75。这种知识不同于将既定的知识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对主体意识和内在价值的把握，触发学生情感、思维、道德和心智等多方面的生长点。为了获得独一无二的“启示”，学生需要经历“被教师教”的过程：在生命和世界的本质面前，教师与学生同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进行精神互动。大学教学就是将未知的事物带入课堂，事物的未知性源于师生间非对称性的结构，这种非对称性无关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对等，而是人生体验和思考认知上的差异。“启示”的获得是让学生对客观知识以外的人文性智识产生顿悟，是一种纯然的求知。比斯塔认为这与苏格拉底接生术思想不同，因为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在“知识即回忆”的角度上以提问的名义掩盖了教学的发生，教师引导学生回忆的“知识”仅仅是记忆的恢复，并没有他者进入生命。而教学是具有超越性的，是对他者的开放和欢迎。“教”的复归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多样的世界中，只有在与他者的相遇中我们才能丰富生命体验。生命的成长没有近道，只能以迎接“风险”的姿态来创造可能性，要么开放自己的世界，让别人走进来，要么主动进取，走进别人的世界。

（三）让教师在风险中成就主体的新生

与寻求科学标准、重视效率而抵制不确定性存在的“有效”教学相反，好的教师愿意去正视这些无法预料的风险。正是这种风险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学到规划之外的内容、获得各种意外收获，也正是这种“风险”赋予教师在没有任何预设的条件下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予以回应的责任。大学教学的这种不完美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正视教学过程中的种种风险，并相信这种风险的教育力量。

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准确把握教学关系特殊性的“教育话语”来促成主体的新生。“教育话语”的重建要求我们正视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风险，并信任这种风险。这样的教学让学生在风险中面临自我持存的挑战，以使学生承担起自我成长的责任，并最终在与他者的教学交往中实现主体的新生。这种获得新生的主体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认识论主体，而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伦理主体，一种只出现在特定伦理事件中的责任主体。这种责任并非是要为预设的结果去努力，而是一种不可知的责任：某人向“我”发出的呼唤让“我”意识到，“我”是在众多他者中被挑选出来的，“我”对他者赋予的责任义不容辞，只有“我”做出回应，主体性才能显现。高等教育的责任在于为学生创设开放多元的空间，引导学生“进入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先于自我意识和规范原则而存在。列维纳斯将这种关系概括为自我对他者具有无限责任的伦理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我’与他者能否‘共生’取决于我如何对待他者。”[22]

不同于以往指向自我的主体建构，他者性视野下的大学教学是通过尊重他者、对他者负责来促成主体的生成。“他者性教学交往是指向他者并为了他者的交往，正是他者在教学交往中的中心地位使责任成为他者性教学交往的核心范畴，为他者就是承担对他者的责任。”[23]在与他者共生的空间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做的就是对学生的吁求有所回应，而不让学生丧失可以言说的机会。前提是教师要创设开放且多元的教育情境，只有在这样不可预知的“风险”环境中主体才有可能实现新生。“教师的人文关怀是师生关系纵深发展的关键因素，学生他者的在场时刻呼唤着教师的爱与责任”[24]，从而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独特的、唯一的存在。教师认真倾听、尊重他者性交往中的声音，并依此做出合理且及时的回应，不仅是对每个学生独特性和创造性的保护，同时也承担起了对他者的责任。与他者共在的课堂场景仅靠教师与学生之间简单的知识存取关系是无法建构的，师生只有在交往和对话中不断发现自身和探索世界，才能通过对他者的成就让彼此拥有成为主体的机会。

学习化时代的到来让学习成为人们生存的一种必要方式。然而，在“教育学习化”的氛围里，学生真正重视的是学习的外在目的，高等教育的教学实践也因执着于对确定性的追寻而放弃了对教学真实性和生动性的欲求，这些日益流行的教育趋势阻碍着主体性的生成。“教”在主体性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作为一种超验性的“异识”进入到教育世界。这种教学会在意义建构中让学生保持面向他人的“毫无保留的开放性”[25]，通过参与对话建立起与世界的关系。好的高等教育不应该预设学生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要引导他们在与现实相遇的过程中探索自身可能的存在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差异、缓慢生长的过程。高等教育的任务就是承担起应有的“风险”和责任，哪怕这些“风险”和责任是不可预测的。相应地，大学教师就要主动担当起这样沉甸甸的责任，唯有这样一份沉甸甸的承担，才会指向未来、指向世界、指向人的解放，并最终在尊重差异的教学中让每个学生都成为独特的自我。

参考文献

[1]格特·比斯塔.重新发现教学[M].赵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皮连生,吴红耘.两种取向的教学论与有效教学研究[J]. 教育研究,2011(5):25-30.

[3]刘雅丽.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现代思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5.

[4]Donald J.J.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J].The OECD Observer,1998(214):4

[5]伊万·伊利奇.去学校化社会[M].吴康宁,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4:18.

[6]杨彩菊,周志刚.西方教育评价思想嬗变历程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5):50-54.

[7]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M].赵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8]Hargreaves D H.Teaching as a Research-based Profession Possibilities and Prospects[EB/OL]. (2007-2-27) [2025-05-28]. https://us.sagepub.com/ sites/default/files/upm-binaries/14790_Hammersley_ Chapter1.pdf.

[9]格特·比斯塔.测量时代的好教育:伦理、政治和民主的维度[M].张立平,韩亚菲,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4.

[10]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改革实施者对话[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5.

[11]周序,付建霖.“双减”背景下如何实现课堂教学的应教尽教[J].中国教育学刊,2021(12):1-5.

[12]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54.

[13]周子荷,刘三女牙,李卿.从学习科学到学习工程:历史跨越与未来走向[J].电化教育研究,2020(11):5-12.

[14]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69.

[15]孙庆斌.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6]Biesta,G.J.J.Freeing Teaching from Learning:Opening Up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in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s [J].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2015(34): 229-243

[17]刘楠,姜正国.教学共生:基于雅斯贝尔斯的教育交往观[J].当代教育论坛,2013(3):79-83.

[18]刘铁芳,王晖.以教学打开生命:走向生命论的教学哲学[J].教育研究,2019(4):34-42.

[19]周建平.追寻教学道德:当代中国教学道德价值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42.

[20]朱文辉.教学伦理属性的遮蔽与澄明[J].中国教育学刊,2021(4):53−57.

[21]简成熙.教育评价时代的危机与 Biesta 的教育美丽冒险[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1):61−75.

[22]冯建军.他者性教育:超越教育的同一性[J].教育研究,2021(9):14−23.

[23]柴楠.面向他者的交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4.

[24]冯永刚,王汝菁.列维纳斯“他者”视角下的师生关系及其构建[J].高等教育研究,2022(1):22−28.

[25]维尔纳·叔斯勒.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生活与思想[M]. 鲁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2.

（《大学教育科学》2025 年第 5 期）

文科教育 | 文科新为 | 张程程

阅读提示：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2025 年第 37 期聚焦“文科新为”，刊发 5 篇文章，此为第一篇。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建成“解读中国、贡献世界”的知识体系：在回答中国之问中破解世界之问，在建构自主话语中推动文明互鉴

◇文科教育深度变革的方向在于由“知识传授者”向“价值孵化器”的角色转向，从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既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塑造社会价值、建立思维模式，到传承文化根脉、化解社会问题，其价值传递融入文明演进的方方面面。

科学教育以“求真”探索客观规律，文科教育则更侧重“求善”“求美”涵养人文精神，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驱动文明进步。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力量格局重塑、科技革命颠覆性突破、文明冲突与价值博弈加剧、贫富分化与生态危机凸显、全球治理赤字等问题日益突出，有待人文社科工作者寻找有效的路径。文科作用的彰显比以往有新的迫切。

范式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文社科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别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其发展水平直接映照民族思维能力与精神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科领域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主旋律更加鲜明，学术主体性持续增强，创新活力不断迸发。

“铸魂育人”是首要目标。教育部推动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课程教材体系，全国高校全覆盖开设相关概论课程并使用统编教材，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巡讲 2 万余场，确保理论入脑入心。

教师队伍是改革落地的核心力量。截至 2023 年底，全国高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活动的教师达 97.9 万人，44 岁及以下青年学者占比 66%。通过全国教学展示、骨干研修、集体备课等活动，103 万人次参与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3.5 万人次参加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赛道，立德树人骨干力量持续壮大。

科研项目和平台建设持续强化。近 10 年来，教育部通过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等有力支持各类研究项目 4.2 万项。以 2024 年为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点方向，支持项目约 3400 项，产出高质量成果 3200 部（篇）；搭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平台，显著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有组织科研向纵深推进。截至 2024 年，教育系统已建成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53 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 30 个。这些平台通过整合实验方法、数据技术与多学科智慧，构建了“问题识别—机理探究—政策推演”的全链条研究体系，成为强化基础研究、跨学科协同攻关与提出政策建议的重要平台。

以此为基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已从四方面实现自主创新突破。

建立问题导向研究范式，以实践调查为根基，构建本土化理论体系与自主叙事。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王炳权举例说道，政治学领域打造本土化分析框架，形成“政党中心主

义”“政党—国家—社会”等分析范式，深研“使命型政党”“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等标识性概念，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叙事体系。

在社会学领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提出“新发展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倡导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建设，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典等学者则将国家、家庭与“关系”界定为中国社会的“元制度”，为本土社会运行规律提供了原创性解释。

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以解决真问题为核心重构标准。核心是摆脱对 SSCI 索引、影响因子等单一量化指标的依赖，构建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践有效性、思想深度与国际影响力的新型评价体系。

近年来，哲学社科学者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从理论推演转向田野实证研究，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陕西师范大学黄河研究中心主任方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从环境经济学与水资源管理视角出发，先后提交数十份建议、议案，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立法。

学术期刊发挥引领作用。作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近年通过设置“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阐释”等栏目，引导聚焦本土议题，推出一批重要成果。

杨典表示，这种“以平台聚方向”的模式，不仅为自主知识产品提供展示和交流平台，更通过评价和反馈机制，引领和促进具有原创性和自主性的知识生产。

建立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体系，以数智化赋能与本土化深耕推动知识生产转型。如政治学领域运用大数据分析与算法模型，揭示政治行为、治理网络的深层规律；实验性研究通过干预变量、控制干扰，破解传统研究“数据失真”“因果模糊”难题。调查研究方法同步革新，在传统田野调查基础上融入社会网络分析、元分析等量化工具，推动“野性思维”向“规范化知识生产”转型，如比较政治学的“质性比较分析”融合定量逻辑与质性特质，精准解析多因互动的政治现象。

研究方法更加锚定中国社会独特性，强化实证支撑。例如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授深耕农村教育研究，十年跟踪建成专题数据库、开展三十年教育实验，彰显“在场、在地”的实证精神。

在杨典看来，社会学者们着力推动“整体主义”传统的现代转化，以系统思维把握社会实体关联，通过深度参与理解文化特性。这种扎根文化特质的方法革新，有效规避了个体主义方法论局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方法支撑。

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坐标系，为解析全球现象提供新认知框架。杨典举例道，中国脱贫攻坚的精准识别机制、数字经济的平台治理模式，通过“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参考。

更深层的突破，在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学术话语。王炳权表示，政治学领域已从这一理念中提炼出三大核心命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基座，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以“共商共建共享”重塑全球治理观，打破零和博弈逻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为涵盖多元议题、以共同发展为取向的国际政治新判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建成“解读中国、贡献世界”的知识体系：在回答中国之问中破解世界之问，在建构自主话语中推动文明互鉴。这既是学术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思想领域的必然要求。

教育革新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核心载体，当下，一场结构性变革正在高等文科教育领域全面铺开。

这场变革首先从专业结构的“提质减量”破题。近年来，高等文科教育针对定位模糊、课程陈旧、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领域实施系统性调整：部分专业因培养目标宽泛、就业适配度低而停招撤销；部分传统专业则因市场趋于饱和、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而持续收缩。

受访专家分析，文科专业的“瘦身”幅度已超过新增规模，标志着其已跨越“重规模轻质量”的粗放发展阶段，这为新兴交叉领域释放出发展空间。

在“瘦身”的同时，文科教育更以“跨界融合”激活新动能——新文科建设成为改革的关键引擎。2020 年改革全面启动，明确以信息技术与文科深度融合、多学科交叉为核心方向；2021 年，教育部认定 1011 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增 3000 余个文理、文工交叉融合专业点，设立 70 个文科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加快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际组织等国家急需领域的人才培养；2023 年《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进一步明

确要求，推动文科内部及文理工农医交叉，通过发展新兴专业、改造传统专业、深化课程改革三维发力。

这种交叉融合的探索在多所高校落地生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增设科技考古方向，将物理探测、化学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传统考古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数字法学教研中心，聚焦数字技术对法律体系的冲击与重塑，破解平台治理、算法伦理等前沿难题……教育部发布的 2025 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显示，多个新文科专业已纳入今年招生计划，覆盖文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关键门类，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初步形成。

学科生态的重塑最终落脚于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越来越多高校将数字工具转化为人文洞察的“显微镜”与“望远镜”：社会学系课程要求学生用 Python 爬取田野调查数据，通过 Gephi 绘制社会关系网络图谱；新闻学院学生运用 Tableau 可视化工具追踪舆情传播路径与情感倾向；法学院与互联网法院合作打造实景课程，学生直接参与 AI 生成内容著作权纠纷、数据隐私保护等真实案件处理；文化产业相关专业联合故宫文创开设工作坊，通过用户画像工具设计 Z 世代文创产品，实现传统文化传播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实践场景的持续延伸，推动文科人才从“知识掌握者”向“问题解决者”的能力升维。

这种变革的深层逻辑，在人才培养理念的升级中愈发清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增岽表示，文科教育深度变革的方向在于由“知识传授者”向“价值孵化器”的角色转向，从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定位更新

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织的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刚需性”正经历重构。

这种重构首先体现在职业形态的深刻变革中。近年持续火热的文科新职业跨界趋势显著：数字策展人需融合艺术史与区块链技术，文物数据分析师要兼具考古学与机器学习能力，AI 伦理师、算法审查专员等岗位的兴起，则直接表明“技术+伦理”复合知识结构已成为企业重要需求。7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17 个新职业中，文科类岗位复合型特征突出。这些变化在杨增岽看来，既折射出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的深度耦合，也源于社会对人的价值需求、文化语境理解及伦理边界把握的深层要求。

治理实践的深度嵌入，进一步凸显文科的现实价值。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科的“实践转化力”愈发关键：政策制定的科学化需要人文洞察支撑，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社

区治理等实践中，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提供底层理论与解决方案，基层法务、涉外合规等领域的人才缺口更直接反映法治治理需求的迫切性。

杨增崇将此概括为文科的“实践转化力”体系：一是精准穿透能力，通过“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理论提炼”衔接微观行为与宏观政策；二是跨界协同能力，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复合知识网络；三是政策转译能力，将大政方针转化为易懂易行的规则。“这些能力转向，要求文科从书斋学问进化为治理现代化的‘智慧基础设施’。”

文明传承的精神根基，更赋予文科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文科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关乎民族精神根脉、社会价值共识及个体文化认同，是国家治理的精神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度融入治理体系：从国家文化公园、古籍保护工程的具象载体，到天人合一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和合共生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治理现代化理念溯源于 5000 多年文明史深处。

人文社科领域更成为国家软实力角逐的核心场域之一。杨增崇认为，面对西方贸易战、科技战与话语霸凌，经济科技发展与话语权建构必须“两手硬”。中国社科院大学副研究员胡兴华表示，西方中心主义是全球治理困境的哲学根源，中国实践为破解困局提供了范本，其理论起点正在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他举例，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重要成果，《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英文版同步推出并在海外发布，正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建立和平发展新叙事体系的重要尝试。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技术狂奔时代，文科价值展现出不可替代的时代使命：既传承文明基因、锚定技术向善，更探索人类在不确定时代寻找确定性的精神家园。这种使命的紧迫性在当下尤为突出——当 AI 伦理争议、数字治理困境、文明冲突加剧等时代问题密集涌现时，文科必须主动破题，以更强解释力、转化力和新标准回应时代之问。

当前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瓶颈集中表现为五方面：评价激励机制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忽视社会效益与政策转化；学科体系划分过细，难以应对复杂议题；人才培养与实践脱节；科研管理制度弹性不足制约研究深度；成果转化梗阻，智库深度研究能力未充分发挥。

杨增崇、胡兴华建议，需以顶层设计推动协同改革：评价机制去“唯量化”、学科体系强“交叉性”、人才培养重“实践力”、管理制度增“适配性”、转化机制通“衔接链”，以释放高质量发展活力。

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协同是强化实效的重要抓手。受访专家呼吁，推动文科教育主动对接产业需求，构建“文科+科技”“文科+商业”“文科+工程”等跨界培养模式，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桥梁，将人文社科理论转化为技术伦理规范、组织管理方案与产品人文关怀。

破解人文社科“失语”困局，根本在于锚定“两个结合”的深层逻辑与路径指引。在胡兴华看来，“两个结合”指引人文社科工作者筑牢文化自信：通过深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脉络中增强文化自信与历史思维；坚持经世致用，走出书斋、扎根田野，在实践中提炼原创理论，锻造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中彰显人文价值。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25 年第 37 期）

文科教育 | 开复旦文科新局 | 吴振东 陈潇雨

◇复旦文科需提升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参与引领学术范式变革能力，直面人类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协同各学科运用新方法工具，基于实证研究作出精深管用的阐释

◇复旦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 3.0 版将实现“三个所有”：所有学科全面重塑人才培养体系，所有学位项目系统改革培养方案，所有本研课程逐一优化更新

在复旦大学 120 年的办学历程中，文科始终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被誉为滋养学术生态的“老根”。这一“老根”既要深扎土壤，更要汲取养分、持续生长。面对时代挑战，复旦大学以新文科建设为抓手，坚定推进文科转型升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三个创新”为遵循“做精文科”，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同向同行，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同频发力，学术范式创新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同步推进。

筑牢根基与技术赋能的双向探索

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领域以“守正创新”为核心，通过夯实学术根基、拥抱技术变革，推动传统学科与时代需求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夯实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基。学校党委成立理论工作组，全面推进一流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建设，整合宣传理论部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及各有关学科的团队资源，办好《复旦马克思主义评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多学科研究。实施“主干学科+特色方向”双轨推进，

构建“经典诠释—现实观照—前沿探索”三维学科体系，推动人文社科基础研究与应用领域、理论创新与现实实践融合，服务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夯实研究平台与成果积淀。学校加强文科实验室建设，组建人文社科实验室战略咨询委员会，出台《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管理办法》，深化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建设；着力打磨“传世之作”学术精品，如中国语言文学系《唐五代诗全编》（50 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大清一统志》点校本（30 册）等标志性文献整理成果，推进“中华早期文明跨学科研究计划”“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当代中国话语”创新研究，促进文化传承与知识共享。

“如果说新工科是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交叉学科，新文科则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交叉学科。”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表示，复旦文科需提升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参与引领学术范式变革能力，直面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协同各学科运用新方法工具，基于实证研究作出精深管用的阐释。

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古文字研究既需要沉潜深耕的“坐冷板凳”精神，也呼唤技术赋能。复旦大学将 AI 技术引入古文字研究领域，为破解学术难题、激活文化传承注入了全新动能。

“现存甲骨片总数约 16 万片，大量为残片或碎片，将它们准确拼合，是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挑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介绍，中心围绕古文字数据采集标注、古文字知识图谱、古文字视觉识别、古文字知识库等方向开展人工智能研发，打造大模型智能体“AI 古文字专家”，将应用于古文字疑难字词考释、古文字形体源流谱系构建与呈现等研究中，为学者提供关键支持。该智能体的阶段性成果已应用于甲骨缀合实践——目前全国甲骨缀合成果已超 7000 组，中心研究员蒋玉斌缀合 500 多组、博士生杨熠缀合 400 多组，AI 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

“AI 生成内容在可信度、规范性上距离高质量人文研究的需求还有提升空间，但我们相信‘AI+古文字’将拓展出更多应用场景，新技术正在重塑研究范式。”刘钊说。

以交叉融合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复旦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 3.0 版于今年 5 月 30 日正式发布，复旦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焱指出，此次改革将实现“三个所有”：所有学科全面重塑人才培养

体系，所有学位项目系统改革培养方案，所有本研课程逐一优化更新，标志着该校在人才自主培养领域进入系统性改革阶段。

招生结构优化：交叉学科占比达 20%，新文科成核心增长极。从 2025 年本科招生计划来看，复旦大学 3820 名招生总量中，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医学及交叉学科五大板块占比分别约 20%，各学科领域实现均衡布局。其中，交叉学科板块以新文科、新工科为核心驱动力，新文科招生规模超过 350 人，成为交叉融合人才培养的主力方向。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文科招生总规模的小幅调整，主要源于高考文科生源结构性减少及部分传统热门专业社会需求收缩，但文史哲等基础性学科招生规模保持稳定。与之相对，新文科培养项目及名额投放显著增加，已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核心构成；在面向 2025 级本科生新设的 120 个培养项目中，交叉方向项目达 53 个，其中由人文与社会科学主导的项目 27 个，占比超 50%，凸显文科在交叉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培养体系创新：以本研融通构建“完整有机体”。复旦大学将大学教育定位为“完整的有机体”，教育教学改革 3.0 版以本研融通为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骨架，将本硕博各学段通盘考虑，目标直指造就原始创新拔尖人才与交叉融合创新人才。

文科门类的本研融通培养项目普遍强化新文科训练，文科院系培养项目的新文科渗透率将超 55%。几乎每个文科院系均布局双学位项目：如外文学院牵头设立 8 个“外语+计算机”双学士学位项目，推动语言学科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新闻学院联合人工智能、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设立 7 个双学士学位项目。2025 级学生进校后，如有志趣、有能力攻读双学士学位，可根据院系相关要求提出修读申请。

学科交叉成为复旦文科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过去十年间联合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团队，组建现代语言学交叉研究中心，构建汉藏、南岛、侗傣等语系源流框架，并与遗传信息比对互鉴，在全球人群迁徙规律解析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学科融合是涵养创新的核心土壤。”金力说，“我们将通过文理交叉、文工结合、文医融通，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进一步擦亮复旦文科品牌，巩固其优势地位。”

系统性创新提升人才核心竞争力

复旦大学以课程体系重构为核心抓手，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通过跨学科融合、

结构性优化与实践导向培养，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

面对新时代人才需求，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务学院”）推进课程改革，通过“加减法”组合拳实现知识体系全面升级：改革更新课程 78 门，新增不少新兴领域课程，形成覆盖本研各阶段的新型课程生态。“学院摒弃‘立新不破旧’的局部修补思路，采用结构性改革路径，以系统集成思维重塑课程知识体系。”院长苏长和说。

改革聚焦“夯实基础”与“前沿引领”双目标，设计两类核心课程模块：一是基座课程，涵盖思想理论、制度纵横、中外比较、政策研习、实践能力、思维方法六大模块，筑牢学生专业根基与结构性知识框架；二是天线课程，瞄准学科前沿动态与国家战略需求，构建进阶式高阶知识图谱，推动理论学习与现实问题解决能力衔接。

以政治学本博贯通项目为例，原国际政治专业核心课《全球治理概论》经系统性改造后，首次纳入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同步新增《计算社会科学》等交叉课程；本研融通方案下，本科高年级进入本研衔接阶段，培养方案新增《政治修辞学》《博弈论》《田野调查方法》《政策推演与模拟》等课程，搭建知识转化与能力培养的方法论桥梁。

双学位项目拓宽交叉培养路径。国务学院积极探索“专业+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行政管理+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项目即为典型实践。2024 级国务学院本科生陈钰泉通过院系选拔，已正式开始修读这两个跨度较大的学科。他修读的双学位培养方案不仅整合两专业核心基础课程，还开设《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AI 赋能的政务服务再造》等特色进阶课程，旨在培育兼具技术创新能力与治理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路径。

针对传统专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经济学院以学科交叉为突破口，通过跨学院协同、培养方案迭代，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社会需求结构调整，国际贸易学科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经济学院于 2022 年主动推进学科转型，联合大数据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双学位项目。该项目聚焦中国制造业升级背景下大宗资源保障与交易安全的战略需求，定向培养兼具大数据技术能力与国际贸易规则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一经推出便获得企业高度关注，首批毕业生已成为行业人才储备的重点对象。

经济学院 2022 级本科生严瑞琪是该项目首届学生。“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跨界学习显著拓宽了我的认知边界，系统掌握经济学与数据科学的复合知识体系，为我提供了更多

元的职业发展选择。”她说。

为进一步深化交叉融合，经济学院计划新增“财政学+人工智能”“药学+经济学”等本科双学位项目，形成覆盖经济、管理、理工、医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培养矩阵。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专业硕士项目已正式获批，标志着学院构建起“本科双学位–专业硕士”贯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致力于推动所有专业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构建面向未来产业需求的新型人才培养方式。”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通过课程重构与学科交叉，学院正逐步实现从“单一知识传授”向“复合能力培育”的转变，为学生应对未来挑战奠定核心竞争力。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25 年第 37 期）

文科教育 | 中国人民大学：承时代之问 建中国之学 | 鲍赫 魏梦佳

◇学生凭兴趣自主申报、自组团队，教师提供选题指引并全程跟进指导，通过研讨、开题、中期及期末答辩，提升探究式学习能力

◇以“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为整体建设目标，人大系统构建起“引领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卓越的人文学科、顶尖的社科学科、新质的理工学科和创新的交叉学科”五位一体学科布局，以技术赋能人文、交叉引领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正深刻影响各行各业，重构教育生态与人才培养模式。以人文底蕴见长的高校，如何回应数字时代对文科教育的新要求？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承时代之问，建中国之学。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一面旗帜”的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在技术变革中积极“破壁”“立新”，以强烈的使命感与创新精神，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探索人文社会科学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的自主发展路径。

学生成为知识生产主体

课程是教学的核心载体，重塑课程体系是人大新文科改革破局的关键支点。

为应对人工智能对传统教学的冲击，人大构建以“I–STAR”为核心的智慧课程体系，

搭建“AI+”创新立交桥，推动文科教育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该体系涵盖“AI+”创研课、技术平台课、思维启蒙课、学科融合课与 AI 时代的教育使命五大层次，核心是让学生从学习者转变为研究者和创造者。

“AI+”创研课是该智慧课程体系的核心，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主、教师精准指导为辅，采用团队协作形式。课程贯穿选题、申请、实施到评价全流程：学生凭兴趣自主申报、自组团队，教师提供选题指引并全程跟进指导，通过研讨、开题、中期及期末答辩，提升探究式学习能力。这意味着学生对“学什么、怎么学”拥有充分自主权。

哲学院 2021 级本科生石耘宇参与的“爱（AI）伴行”项目颇具代表性：团队 6 名学生横跨哲学院、信息学院、数学学院，聚焦现实需求，引入 V-IRL 平台智能设计娱乐方案，通过消费者需求关键词策划个性化活动，满足日常娱乐出行需求。

石耘宇说，最初仅想体验创新课程，却在项目中获得高度自主权——学校不仅提供指导教师选择、硬件设施等支持，更让团队全程主导选题至实施。“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文科生也能在 AI 领域发挥独特价值。”

外国语学院 2022 级法语专业本科生张腾裕，因对数学有着浓厚兴趣，加入“魔方数学原理形式化与 Lean 游戏构建”研究团队，将自主学习的抽象代数知识与学术实践积累的编程经验深度结合。更因法语专业优势，他高效处理项目中大量法文参考资料与讲义，成为团队推进的关键力量。

两位学生的实践，正是人大“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改革的生动注脚：拆掉学科“围墙”后，跨学科协作与自主探索正让知识生产的主角真正回归学生。

“AI+”创研课以文理交叉、学科融合为特点，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形成“AI+”学术群落，是人大跨学科融合与学生主导学习的重要探索。人大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创研课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体，锻炼创新与实践能力，打造教学相长的育人新机制。

打造育才新模式

为对接人工智能浪潮与国家战略需求，人大近年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培养体系，以“文文交叉、文理交叉”融合为核心路径，设立全国首个“智慧治理”本科方向，打造“人工智能与数字社会”“数字法学”“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数字人文”等 19 个

荣誉辅修学位项目，及“涉外法治”“金融科技”“社会学—信息资源管理”等 20 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数字人文系立足交叉融合，探索建立全国首个“数字人文”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创设 42 门专业课程，以“北京记忆”“记忆高迁”等标志性项目为牵引，构建“科研带动实践、项目反哺教学”的产教融合机制——成果持续亮相国内外学术舞台，既锻炼学生实践与研究能力，也推动数字人文成果技术转化与应用落地。

“我们以数字人文系教师为主体，吸纳信息技术、信息资源管理、人工智能、数字媒体艺术、文化遗产等多学科领域导师参与。”数字人文系主任梁继红表示，优质跨学科研究团队为各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跨学科教学保障。

大三学生于凯胜参与了“社会学—信息资源管理”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的学习。“这个文理融会贯通的双学位项目，打破传统范式，运用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技术手段去解决社会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拓展了我的研究广度与深度。”

为打破学科壁垒，人大推出“四年无时点专业选择”机制，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学院等 10 余个学院的学生可自主选择院内课程，毕业前根据培养方案完成情况认定本科专业；学生还能跨学科或跨专业选课，达到要求即可申请辅修学位或专业认证，充分自主规划学业路径。

跨学科培养的实践为人才培养体系升级提供范本，2025 年人大进一步将院系探索升级为全校性战略布局，全面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体系。新体系聚焦国家战略与社会急需，明确班型分为三类：拔尖人才班、创新人才班和战略人才班。

其中，战略人才班瞄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设“涉外法治战略人才班”“国际新闻传播战略人才班”“中意美三学位管理学战略人才班”，旨在通过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实施超常规培养，以“用中学、干中练”模式，培育具备创新意识、实战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尖端人才。

“我们组织涉外法治专业学生赴义乌开展实践实训，这既是法学教育模式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尝试，更是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战略的具体行动。”人大法律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主任姚欢庆表示，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社情，在服务大局中提升专业能力。

人大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秉持“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理念，通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求是学术训练、全员书院制等举措，精准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构建

以学生成长为核心的育人生态——不仅关注知识获取，更注重创新能力、研究能力与国际胜任力的全面塑造。

助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从薪火相传的文史哲研究，到智慧治理、数字人文等前沿领域的开拓，人大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优势，正形成知识体系构建与人才培养实践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格局。

面对新时代对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更高要求，人大校长林尚立表示：“AI 对人文社科是重大机遇。人大将人文社科与新技术结合，‘AI+文科’前景广阔——我们不视其为挑战，而是赋能。”

以“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为整体建设目标，人大系统构建起“引领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卓越的人文学科、顶尖的社科学科、新质的理工学科和创新的交叉学科”五位一体学科布局，以技术赋能人文、交叉引领创新，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新动能。

学校紧密追踪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动态，重点建设新时代智慧治理国家级学科交叉中心，打造适应数字时代的云端共享基础设施技术支撑与新型科研机构平台，搭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创新平台，通过结构性创新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创新引领，精准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以高质量研究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学术创新和知识产出是检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效的重要标准。近年来，人大深入实施“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建设工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例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丛书英文版（30卷）、“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等标志性成果，向海内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在此基础上，学校创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果发布会”机制，至今已举办九场，发布五十余项覆盖哲学、法学、金融学、新闻传播等多领域的重大原创成果，形成兼具学术影响力与社会效应的品牌；发起成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大学联盟”及学科联盟，联合高校优势力量形成研究合力；通过密集举办学术活动，搭建起融通中外的学术交流发布平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

智库建设与社会服务领域同样成果丰硕。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新形态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等为代表的智库平台，近年在国际传播、绿色金融、“一带一路”研究、全球治理等领域产出大批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力的成果，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关乎文化自觉与时代使命的重大工程。我们要立足中国、放眼时代，持续推进知识、理论与方法创新，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人大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

从课程体系重构到交叉平台搭建，从理论创新到成果转化，从人才培养到国际发声……在数字化浪潮中，这所传承红色基因的现代化大学，正高举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旗帜，稳步探索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与人才保障，彰显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底气与自信。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25 年第 37 期）

文科教育 | 中国社科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 岳栋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与话语体系构建须紧密围绕“真问题”展开，应深度契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议题，深入回应人民关切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进入实践转化的攻坚阶段，但学科体系优化滞后、学术协同效能不足、国际话语影响力有限等瓶颈仍待突破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核心战略任务，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战略举措。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已形成多维协同推进格局。

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驱动，聚焦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统筹推进有组织科研、有组织出版与有组织宣传，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锚定中国实践阐释重大课题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聚焦重大课题，强化学术战略支撑效能。中国社科院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人民核心关切紧密结合，为重大决策提供学理支撑。2024 年坚持把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理论任务和学术使命，精心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研讨论证和选题策划，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引导全院专家学者聚焦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重大战略部署、重要改革举措，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和决策咨询成果。

其中，院党组在《求是》发表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性》《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系统集成》等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展开深入讨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法治改革的底层逻辑》等聚焦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人口转型与弹性退休制度》《共同富裕：衡量指标与实现路径》等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理论创新锚定中国实践，建构本土化阐释体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炳权表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突破西方理论路径依赖，基于中国历史逻辑与实践经验建构本土化知识阐释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政治经济学逻辑》通过系统比较各国现代化进程，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既有框架，创造性提出国家现代化“内生型”与“外嵌型”两种发展模式，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经验基础，推动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政治经济学新范式。“植根中国具体实践的原创性理论与概念，是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独特性与创造力的核心载体，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着力点。”王炳权说。

推动学科转型，提升理论解释力。学科方法论的自主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石。中国社科院聚焦经济学、边疆学、社会学等关键学科，通过跨学科融合、历史与现实互鉴等路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范式，显著提升理论的普遍解释力与国际学术话语权。

例如《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突破传统王朝史观与狭隘“民族”观念桎梏，从“天下”“天下国家”等中国历史传统视角出发，动态解构中国边疆历史演进逻辑，为构建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开辟了新路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丛书》融合考古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交叉论证，阐释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平性”等五大特性的历史生成

逻辑，有力回应西方“文明冲突”等偏颇理论，彰显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

强化有组织科研凝聚攻关合力

面对科研资源分散化、学术评价功利化及国家战略需求对接不足的现实挑战，中国社科院以系统性改革为引擎，全面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强化学术研究自主性，构建协同创新与良性竞争并重的科研生态。

以有组织科研凝聚攻关合力，破解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依托战略性顶层设计与系统性协同攻关实现突破。中国社科院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命题”定位，将有组织科研作为破解重大问题的核心路径。

2024 年，由院党组牵头，中国社科院组织跨学科团队，高质量完成多项重大研究任务。在此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初步探索形成“院党组直接领导，职能局组织协调，资深专家牵头把关，多学科骨干分工合作，课题组集中攻关、限期推进”的有组织科研模式，有效实现多学科知识交叉贯通、多领域精锐联合会战，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社科院学科齐全、学术积淀深厚等优势。

以新科研形态驱动学科转型，构建自主创新方法论体系。中国社科院以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集群建设为抓手，通过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创新，推动传统学科转型与新兴研究领域拓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方法论体系。2024 年累计资助实验室综合项目 10 项、孵化专项 12 项、数据库建设 22 项，建成实验室系统分析平台 32 个、专题数据库 45 个。

例如“社会心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集成多模态数据采集、治理与分析系统，整合国内外开源调查数据、社交媒体大数据、文本访谈资料及实验数据等多元研究资源，为社会行为规律与心理机制研究提供“数据驱动+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工具。

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典表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与计算手段向哲学社会科学渗透，不仅加速了学科理论迭代，更促进了跨学科交叉融合，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方法论革新路径。”

以全周期人才培育体系为支撑，夯实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基。中国社科院聚焦“政治过硬、理论深厚、勇于创新”的人才队伍建设目标，构建覆盖“青年成长—骨干培育—领军引领”全周期的人才支持体系。

一方面，打破职称评审“论资排辈”桎梏，出台《职称破格及指标调剂规程》，明确“成

果导向、能力优先”评价标准，取消最低任职年限限制。2024 年已有 13 名青年学者通过破格晋升机制实现职业发展突破，形成“以能力论英雄、以贡献定地位”的人才成长生态。

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科研人员需求，实施“青年学者导师制”“青启计划”“培远计划”等分层支持项目：对新入院青年学者强化学术启蒙与方向引导，对中青年骨干给予科研经费与技术平台倾斜，对学科领军人才赋予重大课题自主立项权，推动人才资源向基础理论突破与现实问题研究集中，确保科研力量“靶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攻坚三大体系瓶颈

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进入实践转化的攻坚阶段，但学科体系优化滞后、学术协同效能不足、国际话语影响力有限等瓶颈仍待突破。

夯实学科根基，以布局优化与技术赋能筑牢体系支撑。学科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其科学性与适配性直接决定体系落地的质量与效能。受访专家表示，学科建设需坚持“需求导向”与“价值导向”并重。一方面加速国家安全学、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国边疆学等国家急需学科的理论体系化与学科建制化进程，推动其成为服务战略决策的“核心智库学科”；另一方面强化绝学与冷门学科的保护性传承，对文化价值突出、传承意义重大但研究群体薄弱的领域实施专项扶持，避免学科断层导致的历史文化记忆流失。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内部细分领域、学科间及与自然科学的理念互鉴、方法移植仍显不足，新技术驱动的科研范式转型滞后。杨典认为，需超越单一技术工具应用阶段，构建覆盖哲学社会科学全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大模型”，整合政策模拟、学术推演、文化传播等多维功能，推动研究从经验驱动向“数据—模型—理论”协同的系统智能范式跃升，实现复杂问题的精准分析与前瞻性预测。

创新协同机制，以学术共同体建设凝聚攻坚合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系统性工程，需突破个体化研究的局限，通过制度化协同与组织化攻关，将分散的学术力量转化为集中攻坚的合力。王炳权建议以“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基层落实”三级机制推动协同：顶层明确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与攻关方向；中层依托跨学科平台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基层汇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组建“矩阵式研究团队”，通过“议题共商、数据共享、成果共创”模式，提升体系建设的效率与质量。

深化国际传播，以开放对话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全球影响力。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度不

仅体现在国内实践价值，更在于全球文明对话中的话语权与贡献度。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需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学术平台，整合国内外资源打造品牌学术会议、学术期刊，为中国学者参与全球学术治理提供常态化渠道；另一方面应推动学术期刊、智库报告等成果的多语种转化，构建“学术成果—政策建议—国际传播”的全链条输出机制，让自主知识体系“听得见、传得开”。

受访专家进一步呼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超越地域、学科局限，聚焦全球发展赤字、文明冲突等共性议题，以中国自主的理论框架解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问。通过参与全球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路径参考等方式，将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25 年第 37 期）

文科教育 | 不止于“诗和远方” | 陈涛

◇文科破局的核心，在于以系统性变革回应时代需求，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实现形态创新——这正是“新文科”所倡导的：学科交叉、能力导向、产业融合、价值引领

◇文科价值的实现，不应局限于学术论文的象牙塔，更需通过产学研协同融入社会发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哈佛大学本科生学院取消 30 多门课程，到国内部分高校缩减文科专业；从研究经费及项目持续向理工科倾斜，到文科教师职业竞争压力加大；从文科高考录取分数线走低，到文科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遇冷”……种种现象共同催生了“文科无用论”。

这是多重社会因素交织的结果：全球经济形势低迷，企业更倾向招募能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人才；经济结构大幅调整，个人更注重实用性与短期利益；科技飞速发展，部分行业面临人工智能替代危机；部分高校文科专业课程陈旧，教学内容与现实严重脱节……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面对当下，文科发展该何去何从？

“文科”困境：学科、专业与就业

当下社会关于“文科何为”的讨论已有不少，但常将三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混为一谈：文

科学科、文科专业、文科就业。

具体而言，作为学科的“文科”其实从未出现问题，它堪称人类社会的“精神基础设施”：历史学通过梳理文明脉络，为当下决策提供历史纵深；哲学通过追问“存在与价值”，为技术发展划定伦理边界；社会学通过剖析社会结构，为社会治理提供微观视角。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文科助力把控科技发展的边界、警示技术滥用的风险、确保 AI 发展服务于人的尊严与社会福祉。

而作为专业的文科，尤其是大学教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困境。

首先是脱离现实。一些大学文科教师躲在象牙塔内，发表一些安全、却仅在学术体系内“有用”的文章，对现实生活帮助不大。

其次，文科存在“功利化”倾向。学生仍被学位导向束缚，卷绩点、实践、加分，卷一切对评奖评优、保研申博“有用”的东西，这些努力对提升对社会的贡献能力效果有限。

再次，“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体系并未根本改变。部分教师将大量精力投入论文发表与课题申报，对教学敷衍了事，一些文科课程沦为“水课”，学生无法获得高水平思维训练与解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最后，文科专业普遍缺乏与社会对接的职业教育，对现实发展和工作需求缺乏认知。

同时，文科就业渠道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传统吸纳大量毕业生的媒体机构、出版单位、文化团体在更新换代中收缩，内容生产领域受人工智能冲击，文字与图像的生产、编辑、校对等工作需求量缩水显著，这导致各类社会组织对文科生的需求越来越小。

重塑文科新形态

文科破局的核心，在于以系统性变革回应时代需求，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实现形态创新——这正是“新文科”所倡导的：学科交叉、能力导向、产业融合、价值引领。

学科交叉是打破传统桎梏的关键路径。文科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议题深度绑定，需破除“纯文科”壁垒，推动与理工科、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文科+”的交叉创新生态，让技能边界从模糊走向清晰。

在此过程中，AI 是推动其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拓展研究方法论，通过海量史料揭示历史规律，借数据分析把握社会行为规律以支撑政策制定，或用算法解析文学作品情感倾向以

丰富理论研究。

应对“学用脱节”，需以重构课程体系为根基，以强化思维训练为核心，以注重能力培养为目标，在满足人文需求的同时注入实用价值。

内容设计上，既要筑牢文史哲基础史论与中外经典阅读的根基，又要让授课内容向现实丰富，引导学生聚焦 AI 时代技术伦理、数字治理等前沿议题，培养敏锐感知与分析能力。

教学方式则需从“教”为中心向“学”为中心转变。通过多样化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在撰写科研报告时掌握逻辑思维，在学科竞赛中锻炼团队协作，在田野调查中培养观察与共情能力，在情景模拟中提升应对复杂局面的智慧，弥合“学”与“用”的鸿沟。

文科价值的实现，不应局限于学术论文的象牙塔，更需通过产学研协同融入社会发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提升社会认可度的关键，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校企共建研究平台，可聚焦城市品牌塑造、历史街区保护等现实议题，让师生在实践中为算法公平、数据隐私、技术伦理等前沿问题提供人文洞察。同时，打破“学术圈内循环”的局限，推动理论向科普文章、纪录片、短视频课程等现实需求转化。更要激发学生创作热情，支持其通过公众号、播客、社区报告等多元载体输出成果，打破学术论文的单一模式，让文科智慧走进“大众视野”。

构建多元价值坐标系，需重构学术评价维度，弱化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的单一导向，将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思想穿透力、文化传播力纳入考核。同时建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评价机制，把课程质量、学生反馈、教学创新纳入教师考核关键指标，推动文科教育回归“育人”初心。

对文科学生而言，既要夯实专业根基，主动补充跨领域技能，培育差异化优势；又要强化问题导向的实践意识，主动对接现实需求，拓宽就业视野，深耕能彰显文科价值的细分领域。

说到底，文科不仅提供丰富的认知，锻炼应对复杂世界的能力，更塑造安身立命的人格。一切思想与实践，最终都会转化为一个人最宝贵的品性、审美与热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25 年第 37 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大学教与学的侵蚀：批判视角下的滥用与价值质疑

| 利奥·麦肯 西蒙·斯威尼

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利奥·麦肯教授（Prof Leo McCann）与西蒙·斯威尼教授（Prof Simon Sweeney）9 月 16 日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当前高等教育界普遍低估了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LLM）工具对教学体系带来的严峻挑战。针对“掌握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必备生活技能”的流行论调，两位教授明确提出反驳，强调其基于实际教学观察的结论恰好相反——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正在实质上削弱教与学的质量，阻碍学生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性思考，并使其远离原始文献的阅读和消化过程。

文章指出，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滥用已呈普遍化趋势。所谓“AI 有助于预习或研究”的说法，实则成为学生逃避真正学习过程的借口，他们借助技术捷径完成作业，却未能发展应有的学术能力。尽管高校尝试出台使用指南与规则，但其约束力普遍薄弱，难以有效遏制学生直接将评估任务交由 ChatGPT 等工具代劳的行为。这种依赖关系导致学术输出呈现高度同质化、枯燥乏味的特点，并频繁出现事实性错误，严重影响学术成果的严肃性与准确性。

文中引用了一项具体案例：在要求学生解读亨利·福特（Henry Ford）1922 年所撰短文的教学活动中，多数答案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加工后，竟将这位历史上以专制和种族主义立场著称的人物描述为“为其企业开发了精密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的“变革型领袖”。这一明显背离史实的结论，揭示出人工智能在历史语境理解和价值判断方面的严重缺陷，同时也反映出学生未经批判消化便接受 AI 生成内容的学术风险。

两位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许多学位项目中，大型语言模型的实际应用价值极其有限甚至根本不存在。过度依赖这类工具非但无助于学习成效，反而破坏和贬损学生的知识建构过程，削弱其进行分析批判与创造性思维的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往往缺乏深度、个性与原创性，无法替代人类在学术探索中所需的复杂推理和伦理反思。

文章最后呼吁，教育界应当以更加审慎和批判的态度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对工作、教育及日常生活的影响，而非盲目追随技术乐观主义叙事。当前亟须正视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术诚信、思维品质与教学本质的潜在侵蚀。唯有通过重新强调深度阅读、独立思考和学术规

范的核心地位，才能有效应对技术滥用带来的负面效应，维护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

（英国《卫报》官网）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评估的颠覆性挑战：一项关于“棘手问题”的研究发现 | 托马斯·科尔宾 大卫·鲍德 玛格丽特·贝尔曼 菲利普·道森

这项研究由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数字学习评估研究中心的托马斯・科尔宾（Thomas Corbin）、大卫・鲍德（David Boud）、玛格丽特・贝尔曼（Margaret Bearman）和菲利普・道森（Phillip Dawson）四位学者共同完成（Corbin T, Bearman M, Boud D, et al. The wicked problem of AI and assessment.[J].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25:1－17.DOI:10.1080/02602938.2025.2553340.）。研究指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正在对大学评估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本质上是一个无法通过简单方案解决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基于对澳大利亚 20 名大学教师的深度访谈，研究揭示了教育工作者在应对 AI 挑战时面临的多重困境。

研究发现，AI 对传统评估方式的冲击呈现出典型的“棘手问题”特征。这一概念由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在 1970 年代提出，指代那些没有标准答案、解决方案必然伴随新问题的复杂挑战。在高等教育评估领域，AI 带来的每个应对方案都涉及艰难权衡：增加口试可以规避 AI 作弊，但会加重教师工作负担（250 名学生每人 10 分钟意味着 2500 分钟的工作量）并可能对非英语母语学生造成不公；允许使用 AI 能反映真实工作场景，却难以评估学生独立能力；回归纸笔考试确保真实性，却无法全面测试现代职场所需技能。

研究揭示了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三重压力：技术快速迭代（如 ChatGPT 持续更新新模型和功能）、教学资源限制（“我们没有资源检测所有违规行为”），以及维持学位公信力的社会责任。受访教师普遍陷入“两难困境”——正如一位教师所言：“我们可以设计防 AI 的评估，但若过于严格，我们测试的只是服从性而非创造力。”这种困境导致政策反复调整、教师职业倦怠等连锁反应。

研究建议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根本性转变应对思路。首先必须承认 AI 评估挑战的“棘手

性”，放弃寻找“完美解决方案”的幻想。具体应对策略包括：赋予教师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允许其根据具体课程、评估类型和学生群体特点选择“相对最优”方案；建立透明的权衡机制，明确每个方案的优势与局限；提供制度性支持，缓解教师的决策压力。研究者特别强调，所有解决方案都必然包含妥协，关键在于建立能够持续适应技术变革的灵活机制，而非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系统论证了 AI 评估挑战的“棘手问题”属性，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它警示简单化的应对措施（如全面禁止 AI 或依赖检测软件）不仅无效，还可能产生新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呼吁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正视这一挑战的复杂性，将关注点从技术防控转向教育理念革新，构建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评估生态系统。该成果对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应对 AI 时代的教育质量保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来源：对话（The Conversation）官网）

战略规划 | 高等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要紧贴时代背景 | 李志民

“十五五”时期，我国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高等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必须深度贴合时代，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紧扣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

国家发展战略是高等学校发展的根本遵循。“十五五”期间，高校规划需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全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响应国家在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上的决策部署，是规划编制的首要任务。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校作为三者的重要结合点，承担着培养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规划中，根据学校现阶段的特色特点，明确自身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如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强相关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

同时，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部署，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引领教育强国建设。这意味着高校要在提高教育质量、促进

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创新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教育国际化等举措，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与国际竞争力。

针对人口变化，应对规模结构挑战

人口出生数量下降逐渐会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变化直接导致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高校面临着控规模的现实压力。在“十五五”规划编制中，高校必须科学预测生源变化趋势，合理控制招生规模，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教育质量下滑。

除了控规模，调整专业结构也是应对人口变化的关键举措。随着生源减少，高校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只有优化专业设置，才能吸引优质生源。高校应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对传统专业进行升级改造，淘汰那些就业前景不佳、缺乏竞争力的专业。同时，加大对新兴专业和交叉学科的投入，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例如，一些高校已经开设了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

此外，人口出生数量下降也促使高校要更加注重提升教育质量。在生源减少的情况下，高校只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才能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口碑，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

应对环境变化，把握发展机遇

当前，高等教育面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除人口因素外，科技革命与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变革是重要趋势。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教育教学方式创新提供了新手段与平台。高校应积极拥抱信息技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校园，开展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模式，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同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教学评价和学生学习分析，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支持，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

能源结构改变与产业变革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兴起。高校要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增设与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与人才保障。

国际化竞争是高校面临的另一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提高，

竞争日益激烈。高校要树立国际视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鼓励师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国际话语权。

“十五五”是高校发展的关键期，规划编制要紧贴时代背景，紧扣国家战略，立足人口变化与规划特性，应对环境变化。科学的规划能帮助学校未雨绸缪，有效应对挑战，把握机遇。通过深入分析国内外环境变化趋势，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使学校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官网）

战略规划 | “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性特征及改革发展策略构想 | 王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截至 2023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 4763.19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0.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是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民生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彰显。“十五五”时期是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快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必要系统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以更好谋划高等教育整体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举措。

“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

“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将面临非常特殊的复杂形势和挑战。未来五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加速演进，大国竞争空前激烈，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会不断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科技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同时，人民群众对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给予更高期盼，满足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任务更加繁重艰巨。总体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六个方面的阶段性

特征。

一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关键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从现在到 2035 年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时间跨度正好是“十五五”“十六五”两个五年规划。“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五年，其关乎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其一，《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 年）》明确，到 2027 年教育强国建设要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其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到 202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要完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其中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任务。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未来将从普及化的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但我国高等教育与教育强国建设要求相比，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相比，与有关发达国家相比，在教育理念、体系结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评价体系、资源保障以及治理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和不足，高校办学特色不够鲜明，同质化发展倾向突出，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十五五”时期，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为“十六五”时期高起点冲刺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攻坚期。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结合点，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升社会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力量。必须清醒看到，当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科研成果多而不优、人才高地尚未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等。“十五五”期间要以高等教育改革为战略支点，一体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打破教育、科技、人才固有的观念边界、制度边界、体制边界、人员边界、资源边界，统筹推进“三位一体”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系统性跃升。

三是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提升期。高校战略服务能力是多方面的。从人才培养看，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矛盾，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协同联动不够。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9—2020 年版）》预测，2025 年集成电路人才缺口约 30 万人。据有关研究测算，预计到 2028 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将达 130 万左右。近期，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对建立健全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部署，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从科技创新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奖通用项目、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占比较高，“十五五”时期可能成为科技发展若干领域的突破期，需要高校产出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有效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回答好国家战略需求

的重大关切。

四是学龄人口增长期。根据有关方面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 18 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波动上涨。“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 18 岁学龄人口的变化对高等教育带来多重挑战，一方面，高等学校需要在目前办学资源条件普遍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深入挖潜扩大学位总量，提供更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另一方面，要加强各类保障政策支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求。

五是数字化转型加速期。当前，全球正经历一场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预计未来 5 年，这场革命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对教育领域将产生深刻影响。未来数字化将与高等教育加速融合，倒逼高等教育教学方式、教育资源与工具、师生角色、教育评价体系、科研范式及治理体系的变革。“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利用数字化赋能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水平再上新台阶。

六是高等教育治理变革期。履行好“十五五”时期的新使命新任务，需要进一步激发高等教育的生机活力，需要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能力。政府要更加注重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高校要对内部管理制度和组织方式适时进行调整。如，为适应交叉学科发展，高校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创新，打破传统院系壁垒，积极构建跨学院、跨学科的资源配置与共享机制。为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高校应建立更加灵活多样的转专业机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策略构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谋划“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中期、长期与远期结合，将五年规划与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教育强国、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统筹考虑。要重点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在统筹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基础上，针对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明确重点发展任务和改革任务，夯实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实现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跃升；着力突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堵点”“卡点”，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十六五”时期及未来发展积累“实力红利”和“制度红利”。

第一，系统谋划总体思路。

在政治方向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在战略定位上，重点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支撑性地位和作用。在宗旨意识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在发展思路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育人为本为根本要求，以提高质量为主题，更加注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加注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二，科学合理设定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

紧紧围绕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以及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的目标，合理确定高等教育“十五五”时期的目标任务。期望到 2030 年，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及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契合，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高校办学特色更加鲜明，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显著跃升，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总目标下，合理确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学研究生数、每十万人口本科在校生数、本科及以上理工农医类毕业生占比、高技能人才占比等指标，并做好与 2035 年预期指标的衔接。

第三，规划和接续推进若干重大举措。

在发展规模上，结合生源人口变化，适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职业本科招生规模。在优化专业结构上，建立健全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在质量提升上，实施高等教育提质升级行动，推动高校差异化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在科技创新上，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上，多措并举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能力，加快建设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一线从业人员。在数字化转型上，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高等教育变革。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特别是促进青年教师成长发展，优化高校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加大力度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在对外开放上，鼓励支持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研修，扩大中外高校学生交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在高校评价上，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引导高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第四，完善支撑保障机制。

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工作机制，统筹研究“三位一体”重大战略问题，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政策，建立一体推进督查督导机制。健全高等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完善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机制，适时适度提高高等教育生均拨款标准，完善多主体经费投入激励机制。逐步提高基础研究预算支出比重。优化高校基础办学条件改善机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加快推进高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和高校章程，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探索高校内部治理模式创新，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有效释放创新活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原司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5 年 9 月 23 日）

战略规划 | 从国际大都市角度谋划上海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空间布局 | 屠启宇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其规模与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人才培养、城市竞争力以及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空间布局不仅要满足本地需求，更要立足全国乃至全球视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全球教育竞争格局。

一、高等教育的属性与上海高等教育的特殊使命

高等教育具有多维度的属性，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高等教育已成为推动城市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软硬实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上海高等教育在服务本地的同时，更应承担起推动国家教育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任。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空间布局，应与上海作为卓越全球城市的战略定位紧密相连，与国家长远发展规划相契合。

二、上海高等教育规模与空间布局现状分析

当前，上海高等教育在规模和空间布局上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与国际对标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在校生规模与城市人口比例来看，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相比，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数据显示，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在校生规模占城市人口的比例约为 5%到 6%，而上海、北京目前的比例为 2%到 3%。这不仅制约了上海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对城市经济的贡献。此外，上海高等教育的生源结构也值得关注。上海高校不仅要满足本地生源的需求，更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学生。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高等教育规模时，不仅要考虑本地需求，更要考虑全国乃至全球的教育需求动态变化。

三、上海高等教育规模与空间布局的未来展望

（一）规模拓展与产业属性的深度融合

上海高等教育应进一步拓展规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在规模拓展过程中，要兼顾考虑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将其作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投入，不仅可以提升教育质量，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上海应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使高校成为城市创新的重要引擎。例如，哈佛大学对波士顿地区的经济贡献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在带动间接消费、促进创新和劳动力质量提升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二）空间布局优化与城市功能协同发展

空间布局方面，上海高等教育应与城市功能协同发展。高校不仅是教育场所，更是城市文化、科技和创新的重要载体。高校的空间布局应充分考虑与城市中心区域的融合，促进高校资源与城市资源的共享。例如，推动高校回城，使高校成为城市创新的核心区域，提升城市活力和吸引力。同时，对于新城和浦东等区域，应根据其功能定位，合理布局高等教育资源，形成各有特色、相互补充的高等教育空间格局。

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部分高校或其专业学院迁回中心城区，利用城市中心的资源和优势，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

（三）多样化与专业性高校的发展

上海高等教育应注重多样化与专业性高校的发展。专业性高校在培养特定领域人才、推动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上海应根据城市功能需求，发展一批专业性高校，如金融、贸易、设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业院校。这些专业性高校不仅能满足上海本地的产业需求，还能提升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教育影响力。同时，上海应鼓励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提高高校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例如，纽约市立大学的研究

生院位于第五大道，这种嵌入式布局不仅提升了高校的教育质量，也增强了城市的活力和吸引力。

（四）开放校园与城市资源的整合

开放校园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既涉及具体的空间开放，更涉及开放性开展高等教育和创新创意活动。上海高校应积极开放校园，与城市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开放校园，学生可以更好地利用城市资源进行学习和实践，同时也能增强高校与社会的互动。例如，高校可以与企业、文化机构、科研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和研究的机会。此外，开放校园还可以促进高校与社区的融合，提升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校企合作平台、社区服务基地等，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

政府应加强对高等教育规模与空间布局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校扩大规模、优化空间布局。例如，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同时，政府应加强对高校的监管，确保高校的发展符合城市规划和教育发展目标。

（二）推动高校与城市功能的深度融合

推动高校与城市功能的深度融合，使高校成为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促进高校与城市中心区域的融合，推动高校回城。同时，应鼓励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文化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例如，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土地资源等方式，支持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项目。

（三）鼓励多样化与专业性高校的发展

鼓励多样化与专业性高校的发展，满足不同领域的人才需求。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专业性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土地资源等方式，鼓励高校发展特色专业。同时，应加强对高校的评估与考核，确保高校的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专业评估体系、设立专业发展奖励基金等，激励高校提升专业水平。

（四）促进开放校园与城市资源的整合

促进开放校园与城市资源的整合，提升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

励高校开放校园，与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例如，通过建立校企合作平台、社区服务基地等方式，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同时，应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与指导，确保开放校园的安全与秩序。具体措施包括制定开放校园管理规范、建立校企合作监督机制等，保障开放校园的顺利实施。

总之，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空间布局应立足于全球视野，紧密结合上海城市发展战略，充分考虑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和经济属性。通过拓展规模、优化空间布局、发展多样化与专业性高校、推动开放校园与城市资源的整合，提升上海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屠启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官网）

他山之石

借鉴与超越：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 | 高杭

摘要：打造高等教育枢纽是知识经济后发国家或地区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知识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对于我国深化新时代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具有借鉴意义。高等教育枢纽建设具有创新整体性、空间集聚性、行政规划性三大特征。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枢纽建设注重科学设定建设目标，谋求差异化特色发展，践行整体性治理理念，汇聚跨部门协同合力，健全评估监测与质量保障机制，以此实现内涵式发展。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处理好扎根中国大地与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从零和博弈向互惠合作跨越，从硬实力增强向软实力提升延伸，从单点推进向网络布局拓展，从集聚要素向畅通链条跃升，从核心理念、功能定位、结构形态、实践逻辑四方面完成对高等教育枢纽建设既有经验的超越。

关键词：高等教育枢纽；高等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教育强国

（来源：《教育研究》2025 年第 5 期）

以“智”谋质：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与特征 | 白玲 王芬

摘要：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国重塑教育生态、抢占人才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战略举措。英国以前瞻性战略规划与体系化布局，成为国家主导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典范。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采取夯实数字基础、加固高等教育数字化根基，深化数字应用、释放高等教育数字化潜能，强化教育公平、推动数字技术普惠发展，施力数字安全、构筑高等教育数字生态屏障等关键行动，形成覆盖全链条的转型框架。其转型展现出四大特征，即决策机制基于循证实践、技术嵌入锚定人本价值、教育变革坚守伦理价值、战略布局指向全球话语建构。英国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通过政策矩阵与技术创新协同，致力于构建包容、共享、卓越的智慧教育生态，以“智”谋质，巩固其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

关键词：英国；教育数字化；高等教育；智慧教育；数字化转型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25 年第 4 期）

高校如何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一项基于国外高校 14 份 GenAI 应用指南政策文本的质性研究 | 王兴宇 陈恺

摘要：作为人工智能的新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高校如何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备受瞩目的议题。为此，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国外 11 所高校发布的 14 份 GenAI 应用指南政策文本进行研究，通过数据收集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的数据分析，形成了高校 GenAI 应用路径模型。此模型通过“价值引领”建立共同理解、“条件保障”打造支持环境、“教育创新”奠定知识基础、“审查评估”规避潜在风险，全方位、立体化地描绘了高校应用 GenAI 的现实图景。之后，文章依托此模型，借鉴国外高校的 GenAI 应用经验，提出我国高校的 GenAI 应用策略，以回应“高校如何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题，并为我国高校实现数字时代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校；政策文本；应用路径

（来源：《现代教育技术》2025 年第 8 期）

国外著名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研究 | 吕宇静 杜严勇

摘要：通过梳理 51 所国外著名高校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文件，研究发现了国外著名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的重要伦理原则。相较于通用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国外著名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整体上更为关注学术诚信，这体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制定与应用场景结合的必要性。进一步挖掘国外著名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的核心内容，分析其在澄清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伦理风险、强调学术诚信与工具使用规范、关注课程设计与教学管理规范、开展组织管理与工具培训指导、重视批判性思维与研究能力培育五个维度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外著名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对我国高校的启示：注重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为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伦理引导；关注学术研究伦理，创新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学术诚信管理；考虑课程教学改革，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创新；加强管理部门的合作，建立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联动机制；与国际同行保持对话，提高我国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制定的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国外著名高校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4 期）

日本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战略及其分层体系设计研究 | 牛可心 顾岩峰

摘要：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是当前各国适应新兴科技创新趋势、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满足人民复杂生活需求的关键点。在社会 5.0 战略、人工智能战略与综合创新战略等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日本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战略分为了“通识素养、应用基础与行业专家”三大水平层次，并通过“数理、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教育项目认证制度”以及人工智能研究生与专家培养计划的标准要求，对每个层次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明确规定。三种不同层次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在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实施体系与评价方式等方面呈现差异化特征，但又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了系统性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金字塔”。鉴于此，我国可从规范人工智能教育分层体系设计、完善人工智能人才特色培养模式、强化人工智能教育产教科教融合和促进人工智能教育质量保障与提升等方面着力，完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人工智能优质人才供给。

关键词：日本；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战略；分层体系设计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25 年第 6 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0 期
第 2 卷第 20 期·总第 31 期
2025 年 9 月 26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